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2月15日第32期
总第178期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78期

上山下乡专辑(二)

目 录

【专 稿】

钱理群 书信里的知青心路历程——读《民间书信》 1-80

【重要启事】

本刊将于2017年实行会员登记制 81

【来信选登】

1. 崔金珂：对会员制的意见和建议 81-83
2. 程真：市场化是大方向 83-84
3. 印红标：读者参与可以以三种方式 84-85
4. 大卫：收费是个好办法 84
5. 陆伟国：不妨把会员分成两类 84
6. 王复兴：降低标准并转载好文章 85
7. 陈闯创：会员应有更多的权益 85
8. 肃慎猫：赞同并支持会员制 85
9. 杨隽：访谈史料能发表吗？ 86
10. 陈闯创纠错 86-87

【本刊声明】

【专稿】

书信里的知青心路历程

——读《民间书信》¹

钱理群

民间思想研究者丁东先生在本书《跋》里，这样论述私人书信的价值：它“只是记录民间思想和民间活动的一种形式，然而却是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具有其它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其丰富性而言，私人信件里提供的许多社会细节和心理细节，是官方文书和官修史书中找不到的；就其真实的程度而言，也是私人写作的回忆录所不能比拟的”。而文革书信产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更具有特殊的价值。文革的“高度专制使人人自危，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不得不戴起面具，学会二重人格”：在公开的场合和公开发行的报刊上，说大话、套话、假话；在私下说有限的真话，在与信得过的朋友的私人通信中，有时更会情不自禁地说心里话。丁东因此说“当时书信甚至比日记更真实”。²

当然，也有私人通信被侵犯的危险，特别是成为监控、打击对象以后，就更容易因私人信件而获罪。为了不留罪证，常常是看完信以后就立刻销毁，一有风吹草动更是首先处理信件。这样，在文革其间保留下来的民间书信就特别少，本书的书信的征集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本《民间书信》就更加弥足珍贵。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如编者徐晓自己所说，编选一开始就充分注意到其“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写信人有学生，有知识分子，有工人，有军人，有干部，有知青”。³丁东说它展示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虽然也有若干书信可称得上是先知先觉的思想闪光，更多的则是记录了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有盲从也有狂热，有怀疑也有困惑，有爱情也有亲情，有苦恼也有哀伤。把

¹ 《民间书信（1966—1977）》，徐晓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² 丁东：《跋》，《民间书信（1966—1977）》，第446页。

³ 徐晓：《前言》，《民间书信（1966—1977）》，第2页。

这些合在一起，更接近那十年中国普通人的整体心态，从中基本上可以看到中国青年心路历程的缩影”。¹

本书出版于2000年。在十五年后，它进入我的研究视野，也是被它所展现的文革时代的普通人的“心路历程”所吸引：写大时代里的普通人的历史，写人的心史，本是我近年越来越自觉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也是出于学者的责任感：这么宝贵的历史资料学术界竟然十数年来少有关注，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我现在作为一个退休老人，有足够的闲工夫，正好静下心来，作一点初步的讨论，也算是对历史当事人，特别是他们中的一些牺牲者有一个交代。

但真正开始进行，却感到无从着手，以至迟迟不能动笔。最后勉强想到两个处理办法。一是把范围缩小到文革中的知青下乡运动，时间就限在1968年以后，对象以知青为主，也包括与知青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留在城市里的工人、社会青年和入伍当兵的青年；二是多抄录书信原文，只作重新编排，简要的背景介绍，以及必要的点评，采取这样的叙述策略，也是为了更多地保留原生态的丰富、复杂性，呈现更多的感性的细节，追求带有个人生命气息的文字表达。

那么，我们就按照历史的顺序，一一道来。

一. 1968——1970年

1968年3月北京知青朱晨晨在写给他的朋友孙康等的信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想起了3月8日北京站悲壮的情景，心潮又会如此汹涌沸腾。永远忘不了那火车开动时的几秒钟，同志们满面啼泪追随火车与我作最后的握手。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我曾多少次抑制自己的阵阵鼻酸；紧紧握住同志们的手，挑动的心房已经悬挂咽喉，再也无法控制这满腔的激动，滚滚热泪夺眶潮涌——我终于在同志们面前哭了，而且有生以来第

¹ 丁东：《跋》，《民间书信（1966——1977）》，第446——447页。

一次哭得如此悲切。”¹

这恐怕是留在知青那一代人灵魂深处的永恒记忆。九个月以后，这年12月北京五十六中的郭路生（笔名食指）也离开北京到山西杏花村插队，经历了同样的离别场面，写下了《这是零点十八分的北京》这首诗：

这是零点十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²

诗一写出，立即在知青中广泛流传，不仅成了知青诗歌，以致文革时期诗歌的代表作，更是一个“知青时代”开始的象征，而且诗中“海浪翻滚，汽笛长鸣”的“雄伟”的时代大场景和母子离别的内心“疼痛”所形成的反差（在朱晨晨的信里则表现为“悲壮”与“悲切”之情的反差）也正构成了由此为发端的知青心路历程的张力。

这就自然引发出两个问题：这一代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知青之路？除了党和毛泽东的指引，国家权力的强制之外，其内在的动因是什么？他们在走上知青之路以后，又遭遇了什么？引发了怎样的各不相同的反应？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¹ 朱晨晨致孙康、黄行书（1968年3月），《民间书信（1966—1977）》，第37页。

² 食指（郭路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第19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一）“任重而道远”

首先注意到的，是哈尔滨的知青巍巍 1968 年 3 月 18 日写给他的朋友王中的信——

目前哈市报名下乡的不多。-----我算是最早报名的一个吧！这是有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我原来所担心的是什么呢？怕到那里，自己的爱好发挥不出来。可是读到毛主席的指示：“今后的几十年，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重要和宝贵的时间呀。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下定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¹

主席对我们年青一代赋予了多么大的希望啊！读到毛主席这一指示，我就不禁浑身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我感到，我以前的想法太渺小了，我太鼠目寸光了，整天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的人是最可卑的。我终于在鄙视过去的旧我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对我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一次认真的开火！我取胜了，我毅然决然地报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我很愉快，你大概也为我这一次胜利高兴吧！让我们再一次握手。

毛泽东的这段话，在我们以后的讨论里，会不断地被知青的书信所引述：这表明它已经铭刻在这一代人的心中。它所论述的此后“二三十年”的“祖国的前途和人类命运”，深深地吸引着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年轻人，它所赋予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与“埋葬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更唤起了雄心勃勃的青年的神圣责任感，为之而献身，就成了自然的人生选择：新一代的天真而纯洁的理想主义者，就这样诞生了。

而这样的理想焕发出的道德感，也成为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威压，写信人巍巍在读毛泽

¹ 毛泽东这一段话见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七三批示》。（1965年7月3日）。

东这段话时的激动与自责，就是为此。他是那样虔诚地谴责自己的“鼠目寸光”的“渺小”：仿佛在这样的宏伟的历史目标与使命面前，一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即所谓“患得患失”都是“可卑”的。他按照那个时代流行的阶级观念，把自己因为担心“个人爱好发挥不出来”而对下乡的犹豫态度归之于“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的大暴露，从而产生一种负疚，以致原罪感，因而自觉地向其“认真的开火”，并因为最终的“胜利”而兴奋不已：一代人自觉的改造、赎罪意识也这样产生了。

他们就这样怀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与刻骨铭心的赎罪感走上了知青之路。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我将在“鬼见愁”的战旗下，打起背包，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为了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

我在数十年后，可以向我们的子孙骄傲地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为这次大革命流下了我的血和汗，作出了一份虽然是很微小的贡献！这难道不是值得骄傲的吗？难道不是令人感到幸福的吗？¹

“祖国”、“世界”、“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子孙”、“使命”、“贡献”，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些大词、宏大叙述所笼罩，决定他们的选择、理想、胸怀、视野、思维、情感、心理、行为与命运。

有意思的是，就在1968年，北京101中学属于“四三派”（红卫兵造反派的激进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任公伟主编了一个油印刊物，也命名为《任重而道远》。在第1—3集中收入了1968年间北京、内蒙古、福建等地“四三派”知青书信21封。其中三封被《民间书信》所收录。有两封引起了我们讨论的兴趣。

¹ 巍巍致王中书（1968年3月1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4页，第35页，第36页。

第一封写于1968年3月9日，写信人与收信人都不详，只知道信是从福建寄往北京的，谈的是文革中的武斗牺牲者——

2月23日晚一百多人开会，隆重纪念贺英、潘仲城烈士牺牲半周年，气氛悲壮。有人痛哭。我们这只队伍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献出两个同志，还要准备献出更多同志的生命。对毛主席忠不忠，唯一就看敢不敢死。有人虽死犹生。有人虽生犹死。——在当
今，就是除了保卫毛主席。生命对于我们毫无用处。¹

第二封信是一位原来联动成员，后来加入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学生写给他的新战友的，写于1968年6月27——28日，写信人、收信人姓名与发收地都被隐去，大概是因为这封信充满了忏悔之意——

由于私字作怪，又加上自己思想中潜伏的特权思想，使自己走了弯路，开始犯错误，中了血统论的毒！——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自己同志采取了压制的态度，由于怕累，甚至连大胆革命都不敢了，为自己所谓“革干”出卖灵魂，站在反动路线上——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决心参加公社的行列，我深深懂得我的同志们是怎样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我清楚地看到他们在一系列的斗争中经过了多少严峻的考验，而更加坚强。²

这都可以看作是这一代中最激进者的誓词：在党内两条路线（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斗争中，坚定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并自愿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即信中所说“对毛主席忠不忠，唯一就是看敢不敢死”。这里暴

¹ 北京——福建两地书（1968年3月9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2页，第33页。

² Xxx致xx、xx（1968年6月27日——2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45页，第46页。

露的对党的领袖的愚忠，正是文革中达于顶点的个人崇拜教育与宣传，在这一代心灵上打下的烙印，成了他们成长中最严重的精神重负。在以后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出，每一个知青为摆脱它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封信所流露的派性也同样引人注目。如研究者所说，知青初下乡时，由于文革中的恩怨，相互之间还存在隔阂，不同阶层、派别的知青时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在山西安邑地区北京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之间就爆发过村落间的械斗，同时发生的还有北京知青与天津知青的群架。如收入《任重而道远》的另一篇写于1968年8月26日的书信里所说，“不要以为现在大家关系很好，表面上也不闹派，但斗争还是潜在的。联动分子及老兵中的顽固者是我们思想上的劲敌。各种思潮的斗争会在生活斗争中显露出来”。但在另一封信里却提供了别一样的信息：“火车上我和一个老红卫兵XXX谈了好一会儿。她向我提了许多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目前的，长远的）。从我们的谈话中，我深感到我们这一代中各派政治势力，几乎在并行地考虑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无非是终极目的不同罢了。正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研究者指出，“在下乡一年后”，知青“基本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发现自己已被社会抛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地一些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压迫和农民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促使知青各阶层、各城市地区和不同派别的藩篱开始消解。各阶层知青在知青点（集体户）中形成了经济核算，生活互助，思想共享的群体，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知青集团最终形成”，由最初的“大冲突”逐渐走向“大走串”（主要发生在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东北、云南、新疆等地区的农村和牧场）、“大融合”，同时伴随着的是不同选择的激烈争论。¹

（二） “面对生活的事实简直呆痴了”

¹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65页，第167—168页，第165页，第164页，第16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出版。

而争论几乎从知青来到农村一开始就发生了。

我们在前文引述的朱晨晨写给孙康的信，在讲述了北京车站离别那一刻的难忘记忆以后，就谈到了对所生活的知青群体的失望，说自己“面对生活的事实简直呆痴了”——

真正没有想到，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那些原以为战斗集体中的人们，竟然露出一副黄歌朗朗入口，酸诗滔滔不绝的本领。软绵绵，不健康的放浪小调几乎每天都从这些人的臭嘴中飘传。丑恶的资产阶级腐蚀剂开始向每个人进犯，要将整个集体污染”。“更使人气愤的是，二队有一家结婚请二队的几个人去（此地结婚形式有很多封建迷信色彩，知识青年不应介入。我们队有几次死人请我们去，就被婉言谢绝）。而他们不但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反而更不顾及人身自尊（最起码的‘知识青年’的称号），不知羞耻地在众席上大吃大喝，抽烟配酒，丑态百出”。“这里没有一点我们一向所喜欢的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与政治斗争气息，反之小市民那种极端庸俗的乌烟瘴气猖狂泛滥。他们有时候相互吹捧，溜须拍马，有时候突然转变为相互嫉妒、污蔑、咒骂；然而尤其可怜，激烈的争吵，骂架达到极点的时候，往往只不过为了一小片饭锅巴或半口米汤。

提起来更使人伤心的是栾XX。我曾经问过二队的关X，栾近来思想状况，以后想干什么？关说：“他很平常，没看出有什么不干的苗头，他只跟我讲，今后要学会木匠手艺，学会唱楚剧和地方戏。”我听后大吃一惊，这难道就是我们曾经同志的雄心大业吗？

朱晨晨因此对同伴的“小市民化”深恶痛绝，感到极度的孤独与寂寞：“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冒着风雨漫步在大洪山脉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开始感到“厌倦”，“几乎半个精神世界都处于悲观失望、昏沉不觉”之中。但他又恐惧于这消沉，于是就从昔日战友的来信里，唤起当年“峥嵘岁月的深深回忆”，努力用“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而永不回头”这句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早年的誓言来激励自己——¹

¹ 朱晨晨致孙康、黄行书（1968年3月），《民间书信（1966——1977）》，第37页，第38页，第39页。

看来朱晨晨是一位仍然坚持理想主义的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他要完成向作为改造对象的劳动力的知青的转变，并不容易。他的“面对生活的事实简直呆痴了”的感受是真实的，而且极具代表性。他的困惑其实有两个方面。首先自然是他反复强调的，和与自己有不同选择的知青的格格不入与反感。其实，在此之前，出于对文革无休止的斗争的厌倦与抵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批逍遥派，人们失去了革命热情，开始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物质利益、个人兴趣。现在知青被赶到农村，更有被社会放逐的感觉。于是，当个普通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不再关心政治与运动，就成了相当普遍的选择。但又看不清前途，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绝望、颓废、得过且过的消极情绪更是在知青中普遍蔓延。朱晨晨信中谈到的唱所谓“黄歌”，借机大吃大喝，陷入日常生活的琐细冲突等等，都是这样的情绪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是构成了知青生活与思想的主流。

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之下，朱晨晨们要坚持革命理想，留恋“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与政治斗争气息”，就显得不合时宜，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他们的心理上却产生了一种这一代人的危机感。

同时收入《民间书信》的另一位北京红卫兵写给在广州的朋友的信里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一想到革命先烈，就觉得那些丧志青年是多么渺小和可笑啊！我看到了不少有了爱人，丢了事业的例子。我真怕中国青年会步苏联青年的后尘。那么我们的江山将在这代变色，那将是多么令人痛心啊！”¹忧国，忧民，忧自己，又忧同代人，就真正陷入困境了。

朱晨晨们的困境的另一面，是始终放不下他们自己所说的“‘知识青年’的身份”带来的“自尊”，实际上是所谓“改造落后农村”的使命。他们因为警惕“封建迷信”而拒绝参加农村婚丧活动，更视同伴学习农村手艺和民间艺术为“堕落”，这样也就根本不能融入农民农村的日常生活，而陷入了“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自我孤独的尴尬之中。

（三）“青年的分化”

¹ 刘芳致党育书（1968年7月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48页。

朱晨晨的信，遭到了收信人孙康的严厉批评。他在1968年的回信里，直言不讳地说：“整个来看，这封信里充满了消极、悲观、空虚、怅惘，甚至绝望的感情，是灰色的，是应该批评帮助的”，“它反映了一些刚踏入社会，深入实际的幼稚、脆弱的小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有一定代表性”。

孙康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针对朱晨晨信中所说“这里并没有一点我们所一向喜欢的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气息”，指出这背后有一个如何看待农村生活，在与人民群众关系中，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劳力者’，要从事繁忙沉重平凡的工作，而我们是‘劳心者’，要从事‘一向所喜欢的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要“做人民群众之上的人，做广大工农兵之外的人”，它会“妨碍我们在农村扎下根去，妨碍我们正确认识贫下中农并主动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而“只能使自己孤独于广大人民群众之外，徘徊于时代的洪流两旁，在人为制造的悲剧中耗尽自己的才华，废完充沛的精力，成为小资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谓牺牲品”。另一个批评重点，是指出朱晨晨把向农民学习手艺视为“平庸”，拒绝做平凡人、平凡事，是落入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由于思想方法不正确，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农村，不能正确地认识贫下中农，不能正确地对待集体和同志，而且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而严以待己，宽以待人。似乎周围都是一滩污浊臭水，唯独自己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莲花”。

特别值得注意的，孙康由此提出了一个更为严重、根本的问题：如同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一样，当下也出现了“青年的分化”。这种分化是围绕“和工农相结合”问题展开的，背后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孙康特意指出，“文化大革命杜绝了升大学进研究院考博士一举成名的门路，因此很多人都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政治，也出现了一些野心家。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上山下乡，留恋于安逸舒适的生活，成了沉醉于客厅讲政治、逛公园、谈革命的时髦风流的贵族革命家，他们实际上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提倡‘进研究室’、‘啃书本’以便著书立说标新立异，完全和五四后的胡适一样”。孙康指出，如果拒绝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立场不改变，

即使到了农村、工厂，到了实际中，也是“满眼是阴暗、落后，与自己的幻想相违背，到处是平凡的群众，平凡的生活，平凡而又繁重、艰苦的工作，于是看不到光明和前途，经受不住长期艰苦生活的考验，产生了‘什么时候算到头’的逃兵思想”，再加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懒、散、娇、骄”几气同时发作，相互影响，就必然陷入“精神苦闷，思想颓废，生活放纵”的泥潭，不能自拔。孙康因此向自己的战友朱晨晨们发出警告：“我们现在只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我们还绝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即使自命为“左翼”，“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就会变成右翼，跑到另一个极端去”。¹孙康对朱晨晨来信中暴露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

可以看出，孙康的批评的基本立场，出发点与归宿，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一时代命题，这正是知青运动和文革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在知青运动起始阶段，影响，甚至支配知青思想的还是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知青要从中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孙康提出的知青运动中“青年的分化”则是事实，很值得我们注意和讨论：可以说，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并引发了不同的选择与争论。

（四）“扎根派”与“不相信派”之争

这首先就是研究者所说的“扎根派”与“不相信派”之争。

在收入《民间书信》里写于1969年的两封信，就已见端倪。一封写给我们在下文将要详尽讨论的赵一凡的信里，就引述毛泽东“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的名言，表示“我已经爱上了农村，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我下定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²而另一封已经在山西插队的弟弟写给还留在

¹ 孙康致朱晨晨、栾永康书（1968年7月），《民间书信（1966—1977）》，都52页，第55—56页，第54—55页，第53页，第54页。

² 芙平致一凡书（1969年3月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87页。

北京的哥哥的信里，则斩钉截铁地一再叮嘱：“农村不是去的地方！一定不能去！”¹显然并不相识的两位知青对农村与下乡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又都这样坚决，是很有代表性的。

据研究者介绍，两种立场与态度的正面交锋，发生在1970年。争论的发动者是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的激进派红卫兵任公伟等，他们当时在吉林突泉乡插队，1969年12月，县里召开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结插队一年的经验。任公伟等发表了题为《身在农村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的长文，指出：“在目前青年运动中确实存在一股反对与工人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逆流，以及不问政治，不参加阶级斗争的倾向”。

这里所针对的，正是在1968年至1969年知识青年中出现的新动向，即开始了自觉读书活动，出现了最初的思想沙龙。这样的读书活动和沙龙在红卫兵运动的后期，即1967年与1968年初就已见雏形。先是被迫退出文革舞台的老兵们聚集一起从理论上探讨“文革”之谜，后是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进行反思。知青运动兴起后，沙龙大部分成员都到了农村，少数人还留在城里，继续读书、讨论。到了1968年秋收以后，大批知青返回城市，到1969年秋冬就有更多的知青回城。按研究者的说法，“一些在乡村无法完成的文化任务，都转移到城里来完成”，在完成由红卫兵到知青的身份转变，有了“新的社会角色”，并有了农村体验与经验，就“从新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并提出一些新的政治观”。老红卫兵沙龙的代表人物徐浩渊在陕西插队并进行农村考察之后，回京后整理形成《陕西农村考察报告》。另一位老知青张木生也在1968年秋，写出了长达三万字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北京四中的老红卫兵的代表孔丹、李三友、秦晓等，则结合下乡经验，写出了长篇报告：《时代——使命——准备（讨论提纲）》。这些文章都在沙龙中引起强烈反响，而张木生的长文影响更大，因为他不但对知青运动，而且对农村现行体制都提出质疑，并且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路，例如强调要“发展生产力”，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入手，等等。²这可以说是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最早出现的冲破文革意识形态束缚的

¹ 保英致大哥书（1969年2月1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83页。

² 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下册），第140——14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新思想”，也是文革后期民间思想的重要成果，意义自然十分重大，我们已有另文专作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其爆炸性影响，张木生就自然成为任公伟等主要的批判靶子。

1970年，任公伟等先是在北京沙龙里与张木生等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论争；接着又在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任重而道远》里，著文批判“张木生之流提出的新观点”是中外修正主义的旧货色，文章指责张木生等在沙龙里“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苦钻大部头，却对毛主席著作不感兴趣。大读封、资、修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向上爬》（英国）、《怎么办》（俄国）、《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之类，欣赏星期音乐会，唱黄色歌曲、黄色小调”。据说张木生等的主要错误，首先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所谓“不相信派”，任公伟等与张木生等的论争，因此被称为“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张木生等对现行农村体制质疑，就被看作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党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张木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打破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¹这样，这场所谓“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论争，最后就纳入文革的阶级斗争轨道，并且有着明显的文革派性斗争的痕迹。

但“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分歧与争论，却还要延续下去，它是贯穿文革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们在下文还会有相关的讨论。

（五）关于农村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论争

任公伟等的批判文章所说的“张木生之流”，直接点名的，徐浩渊之外，就是赵金生。赵金生原名赵京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也是北京读书沙龙的活跃人物。他的惊人之举是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发表不久，就贴出题为《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大字报。其原文没有保存下来，据他自己的回忆，主要是引述毛泽东《在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以有三种形式，

¹ 以上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26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第169页。

一是走马看花，二是下马看花，三是安家落户。即便是安家落户，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上山下乡——纯粹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我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照样可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¹他的同学赵振开（北岛）回忆，大字报还有这样的内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会导致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²如此大胆妄言，自然被工宣队视为公开挑战上山下乡运动，就将赵京兴抓进学校，隔离审查。在此前后，赵京兴写出了两篇讨论基本哲学理论问题和思考中国发展道路的文章：《哲学批判》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提出“认识论哲学最终必然演变为人学，即以人的活动（实践）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并提出了“人的本质就是对必然争取自由”的命题；关于中国农村的变革，赵京兴认为，无产阶级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对传统小农经济进行改造，需要“用商品经济来打破农业个体的自给自足生产的桎梏”，从而使农业像工业那样，实现社会化生产。只有如此，人类才能进入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整个人类劳动将用强大的工具体系为自己与自然建下巨大的屏障，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劳动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两篇文章立刻在沙龙中广泛流传，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他的女友陶洛诵把《哲学批判》借给女师大附中的同学，又被刻成蜡板油印出来，却闯下大祸：被公安部门当作油印反革命传单，而于1970年1月，将赵京兴与陶洛诵同时逮捕入狱，关押了三年。³这个事件给当时的沙龙以很大的震动，可以说是沙龙自由阅读与独立思考所付出的第一个代价。

收入《民间书信》的写于1969年春的插队山西的两位北京知青的通信，是对赵京兴的新思想的反应。信的一开头就明确表示，赵京兴的“有的观点，不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农村实际情况，不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很明显的”。接

¹ 赵京生：《我的阅读与思考》，《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第29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² 赵振开：《走进暴风雨》，《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第212页。

³ 赵京兴：《我的阅读与思考》，《暴风雨的记忆：1966——1970年的北京四中》，第296页，第295页，第197页，第298页。

着就作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反驳——

“赵认为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给自足的方式，——不能因地制宜地使用土地，实行农业分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他看来），作为代替这个生产方式的比较理想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全部内容，就是实行土地分工，因地制宜”。而在我们看来，“商品经济一旦发展起来，将不需要什么‘土地分工’，它只会使人们获得平均的利润（不算级差地租）”实行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那里的农业工人还是避免不了遭受准备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命运”。因此，“我国农民贫困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在于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农村的落后”。

“赵在信中首先批判了有关改造农村的两种主张。我觉得这两种主张（利用大机器改造农业和利用知识青年下乡、医疗队下乡等一系列措施改造农村）都不是最重要的，但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赵对这两种主张的批判都是十分实用主义的”。“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已被历史证明是反动的，可见片面强调机械化是不对的；但实行农业机械化是大势所趋，任何企图阻碍这个运动进行的想法都是反动的”。“医疗队下乡等措施，固然不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但是有着其深刻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考虑。现在所实行的合作医疗、公办小学下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建立农村工业等，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一部分，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有效措施，绝不是毫无意义的”。

“赵京兴在谈到政治革命时说，政治革命的对象是‘那些作为这种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的，毫无头脑、不学无术却握着领导地位’的‘党阀’、官僚们。他没有说出那些‘党阀’‘官僚’为什么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的补充，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的‘农业分工’‘商品经济’都只是一种空想，是乌托邦式的政治改良，而又偏偏要挂出政治革命的招牌。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并没有力图保留自给自足的细小生产方式而又占据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

这封信的最后指出，“赵对农村革命的看法是有他的理论基础的”，“赵一向把生产方式

同生产关系截然分开，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是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崭新的生产方式，甚至可以叫作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正是写信人所不能接受的。¹

尽管写信人是用当时的主流观点来批评赵京兴多少有些异端的主张，但应该说，这还是一次心平气和的讨论，并没有前面所引批判张木生文章那样上纲上线。更重要的是，两位年轻人如此严肃认真地来讨论农村变革、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进行独立的理论探讨，这本身就意味着知青一代已经开始走出狂热与盲从：这是他们文革心路历程的一个重要变化。

（六）理想主义者的不同走向和相互纠缠

收入《民间书信》写于1968年最后一天的这封信的写信人和收信人“戎”与“潘”，都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全名是戎雪兰、潘青萍，她们都属于“四三派”，是激进派的红卫兵，戎还是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曾和同学校的老兵的代表人物进行不公开的辩论，探讨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在1968年春，北京中学开始出现跨校际的研讨会时，戎和潘都是其中一个小团体“二流社”的成员，前文提到的35中的孙康、101中学的任公伟也是其成员。以后他们和属于老兵派的徐浩渊等也有密切交往，共同讨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未来国家的命运等话题。这些小团体活动是为知青沙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²

写于1968年12月31日的这封信里，戎向潘倾诉的是，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在遭遇精神困境时，对“同志的友谊”的呼唤，对理想的坚守。因此，信的一开头，就说：“让我们俩双手紧紧相握，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绝不背叛，绝不离弃”。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人民”，“信仰”，“责任”，“历史”——

¹ 魏光奇致张雷书（1969年春），《民间书信（1966—1977）》，第89页，第90页，第91页，第92页，第93页，第94页。

² 参看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26—127页。

我们——红卫兵，是在人民苦难的大动荡中觉醒的，是在信仰的旗帜——光辉的5.16通知（即1966年5月1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般认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令）下聚集起来的。如果谁因为个人的遭遇，冷淡了人民，丢掉了信仰，她就会被永远抛弃；不论她个人是在深重的苦难中，或是处于权利的地位。

我们了解时代的责任，我们对时代的心脏，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有着高于同一辈人的更敏锐、强烈的内心感受，我深信，我们所激动，所致力于奋斗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和需要，就决定了我们是能够被历史录用的人。

但是，这一切，现在都遇到了挑战。“前面的路”究竟怎么走？“用安慰来平息痛苦，是庸人的作法。我们要用希望来填充思想上的空白，用战斗来把自己振作起来，在苦难中，人成熟得更快”。而希望正在自己和“我们”——

在今后的事业中，我相信，我们永远是男子汉大丈夫式的朋友，这不是用禁欲主义约束而成的，而是共同的战斗，超乎性的精神和伟大的理想。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路已选下，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通过不断的社会革命，达到共产主义，再没有别的了。

“一切为了别的目的/而牺牲的人们/都是疯子。”（裴多菲）。¹

这里高谈“信仰”、“责任”、“时代”与“历史”，从表面上看，和我们一开始就引述的1968年初巍巍表决心的信很相似，但却有更复杂、丰厚的内容。那时候一切都还开始，而现在到了1968年年底，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如其文字里所透露，面临的是精神的“痛苦”和“思想上的空白”和不振作。这是在遭遇挫折与危机时的坚守，也可以说是在产生了怀疑以后的坚守。因此，在有了更多的经历以后的1984年，即十六年以后，收信人潘再重读这封信时要说：“如果不了解那个充满创伤的背景，这些话或许会显得空泛”，其实或是“用那个时代武断的语言表达了青年人应有的豪情，以谴责软弱来鼓舞勇气”，“当我们经受苦

¹ 戎致潘书（1968年12月3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67——68页。

难时，我们反而不会叙说苦难，话语和现实是分裂的，感伤的回忆是在苦难结束以后”。¹

其实1968年末的戎和潘，以及他们那样的正在经历“红卫兵——知青”角色转换的年轻人，正处于“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极端分裂的状态”，仅仅靠坚守原来红卫兵的信念，是不能走出危机的，这就需要寻求新的精神资源，探索新的出路。在潘的记忆里，这同样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精神历程——

最终使我们冲破几十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记得戎是从何处借的；读过后，我们都郑重其事地相约到颐和园，交谈彼此的感想，那是六九年的十月；从石舫远望长堤，秋天明丽而萧索，我们心情激动；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的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版的桎梏和愚昧。

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叶甫图申科和梅热拉依梯斯的诗集，而当时在我们小圈子里十分流行的《在路上》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我却并不喜欢。我和戎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我们自以为看透了社会以后，所关注的只有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农村，过着最底层的简陋而辛劳的日子，回到北京，便成了精神贵族；读遍了能够找到手的世界名著，只要有钱，就去“新桥”和“老莫”（按，指北京新桥饭店和莫斯科餐厅，都是当时著名的高级餐馆），我和戎轮流做东。我们喜欢泛着奶油香味的菜肴和银光闪闪的餐具，一本正经地呷着小杯的威士忌，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抵偿在乡下度过的原始而粗糙的生活；那时的生活多少有些模仿性和戏剧性。²

¹ 潘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民间书信（1966——1977）》，第71页。

² 潘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民间书信（1966——1977）》，第72页。

这可以说是一代人的永不磨灭的记忆。北京31中的甘铁生回忆说，他在山西太谷县窑头公社杨庄大队大平小队插队。同队的九个知青每天下了工，吃了饭，已是筋疲力尽，但仍然坚持用墨水瓶制成的油灯读书，灯焰太小，挤不下三两个人，就轮班看。第一拨从晚饭后到十一二点，第二拨从十二点看到三四点钟，再叫醒第三拨看到天明。当外村传来好书，限定两三天还，大家就轮班看，通宵达旦。而这样的读书也是冒着政治风险的，县委知青办就开会批判他们的知青点，用看马列原著来抵制读毛主席的书。

这样的山村夜读与戎雪兰、潘青萍们的京城读书，相映成趣，构成了一道从1968、196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独特的知青精神风景。有人回忆说，当时的知青几乎都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抄满了摘自书籍和手抄文学的片断。从最初的摘警句、找结论，发展到系统的理解，在西方和俄罗斯文化里发现新世界。可以说，灰皮书、黄皮书帮助这代人摆脱文革主流价值体系的桎梏，重建新的世界观。用研究者的话来说，“从此他们告别了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回归到‘人’自身”。¹

读书之外，还有广泛交友。戎和潘结识了北大附中的阎恒，并通过他与北大物理系的何维凌、王彦相识。1967年底阎、何、王三人成立“共产青年学社”，因宣言里有反林彪的倾向而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何维凌为此住了两年秦城监狱。这是和戎和潘圈子不同的另一类理想主义者；“尽管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掉，却已决心在未来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因此，必须处于社会中心”，而且他们尝试使自己的日常生活崇高化，完全按共产主义原则生活：作为待分配的大学生，学校发给为数不多的生活费，加之每人从各自家庭得到钱，不分多少，统一按需分配。他们圈子里的人际关系也是“毫无保留，不分彼此，没有个人隐私的”。这一切都使得戎和潘既感到新奇，又颇有些疑惑，觉得“本质上不是一路人”，但却又被其“具有天赋的才华”和为信仰献身的精神所吸引。1969年冬天还专门住进北大当了四十天的“学生”，请何维凌讲课，教授微积分，并“把数学和哲学联系起来”。空闲的时间，就去未名湖畔散步。听何维凌侃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陀斯妥耶夫斯基

¹ 转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29页，第130页。

的《卡拉马佐夫兄弟》。¹以后，他们各自走上自己的道路，仍有书信来往，而且留下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收入《民间书信》的两封信。

第一封是1969年12月13日阎恒写给潘、戎的信。潘介绍说，1969年初，阎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半年后，作为云南几万青年的代表，赴京观礼，并觐见伟大领袖，自然春风得意。而此时的潘、戎如前文所说，思想已有了改变，并不以此为然，就写了一封揶揄的信，²大概说了“少年得志”、“踌躇满志”这类的话。阎信是一个回复，既是辩解，更是表白。

他这样认识自己这个“正牌干部子弟”代表：“我们无产者所具有的马列主义斗争哲学、奋斗精神，对社会的认识、适应能力以及为达到崇高理想而焕发出来的毅力，使我在许多方面高于他人之上”，“比较起来我们是最崇高、最纯洁、最有理想、最懂得社会、最温文尔雅、最有前途和最厉害的。”他还这样谈到自己的中心位置：“我周围有两个最忠实于我的好朋友，不仅仅是朋友，一个身强体壮，忠厚老实；另一个精明强干，聪明，善良，他们俩都把我的成就看成是他们自己的成就，在各方面支持我，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鼓励、支持和温暖。”

他把“其他人”分为四种：一，“志大才疏，不了解社会，仅仅追求他们心目中的自我高尚，坐等待时机的‘伏虎’，我看终不足成大事”；二，“正统派，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修养派”；三，“生活派”：这三种人，或难成大事，或应该淘汰，或胸无大志，自然不在眼里。只有第四种“野兽派”，“尤其是一些大痞子，却很有点头脑，很了解社会，尤其明白人的心理，这些人有的很可爱，他们的‘堕落’往往是由于不愿意随从世俗而坚持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识而造成的。有一些甚至可以大有作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我这个‘正牌干部子弟’代表很客气，我的一些话比他们之中‘份儿’最大的人的话还受到尊重。我准备帮帮几个人改邪归正，这是可利用的力量。”如此重视“痞子”，倒让人想起同样把痞

¹ 潘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民间书信（1966——1977）》，第74页，第76页，第78页。

² 潘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民间书信（1966——1977）》，第75页。

子视为“革命先锋”的毛泽东。

于是就有了“要把我的主张‘强加于人’或付诸于世”的志向，并且深知要最终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努力奋斗”：“社会就是一个大战场，我们步入社会就是上了战场，上战场就要战斗，就要勇往直前，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或萎缩不前。”

而且他是充满自信的：“事实上我昨天的话还是廉价的，而今天则有了几分力量。明天呢？”“我已感到自己真正成长了，有点大丈夫的自豪感。祖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年轻人无所作为，多愁善感的气质仿佛是遥远的过去。”¹

多年后，潘这样看待这封信：“信中既有认真的求索，也有天真的自大；就当时而言，阎的思想并非正统，但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的入世倾向”。²这或许是比较客观的评价。今天我们却从中看到某些令人不安的东西：那要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烈的权力欲望，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或付诸于世”的志向，是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结合；而不惜利用听命于己的痞子，更是蕴含着“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危险：这正是文革培养出来的活生生的“小毛泽东”。

少丁（何维凌）写给 pian（应是潘）的信写于1970年7月21日，此时何在江西干校劳动，潘仍是白洋淀的知青。信一开始就大谈“友谊”：“我们在世上几乎失去了一切，残酷的现实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惟有友谊永远属于我们”，“惟有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友谊最珍贵也最纯洁”。接着谈自己的文革精神历程：“在这十年中，我也有过好几次的精神危机，从抽象的理想到具体的理想，从维护现实到向现实宣战，从奋发科学到立志革命，总之，从必然走向自由，经历了许多波折，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性格变化很大”，态度坦率而诚恳。多年后潘回忆起来，仍觉得其中“有一种坦诚的真实”。

信的重心却在对青年动向，现实和未来的分析：“运动后期，我看到更多的青年是颓废、放荡，或者是平庸碌碌，或者是投机钻营，真正敢于立足于理想，坚定信念，百折不挠、

¹ 阎恒致潘、戎书（1969年12月13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26页，第127页，第128页。

² 潘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民间书信（1966—1977）》，第75页。

积极进取的还是少数”，“过去我们接触过不少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可是永远走下去的少，半途而废的多，多少人成了我们理想的背逆，或是匆匆过客”，“惟有在令人窒息的平静之中，决不动摇，以自己默默无闻的思想和行为向社会挑战的，才是真正的人”。

其实这也是在言志：“在任何时候我都信心十足，都有决胜的信念。我想，之所以百折不挠，其关键在于坚信理想，坚信我对它的科学分析，从人的本质出发而坚定其必然实现的信心。此外，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以心发现心，我有同志、有朋友，在我足迹所到之处，并没有留下什么悔恨的痕迹”。最根本的，还是对精神力量的信念与信心：“精神力量对于人来说，是无穷的，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确定不移的行动。有人认为这都是幻想之属，但我完全不这么看。捷尔任斯基说得好，要有幻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幻想变为科学的理想，从而化为生动的现实。当你苦闷的时候，应该多想想同志、朋友，应该去冷静地分析一下自己的信念是否合乎真理，只要是这样的，那就坚定地走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应该为欢乐而生活，为生活而欢乐，要永远欢乐”。

当然，也谈到了自己在十年磨砺中的另一面：“我总结自己的教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过分相信别人，以善良的愿望去揣测别人的叵测之心，也在于过分理想化地看待斗争——但这些都没什么，我懂了！”“而今我除了在同志朋友中还保持（同情，热情）这个特点之外，几乎变得很冷酷，像一柄剑”。¹

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位“新人”（在信中他宣布自己要建立的是“新时代新人的新关系”）：如潘所说，“只有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意志才是他的本色”，那样的坚守理想，富有幻想，那样一种不可抵御的精神力量，都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但同时，在这样的新人身上又分明可以感到某些同样令人不安的东西，或许就是潘所说的“统治欲望和性格中的暴虐倾向”吧。然而也如潘所说，“在热情的激荡下，即使是野心也显得崇高”²：这又是另一种形态的文革养育的“小毛泽东”。

¹ 少丁致 pian 书（1970年7月2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36页，第137页，第138页，第149页。

² 潘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民间书信（1966——1977）》，第80页，第81页。

而这位“新人”现在（1970年）还在不无焦灼地等待时机：“我感到，才华就像成熟的蜜果一般，稍一碰触就会肆溢纵横。可是就缺少条件，一点点也没有！”¹

这样的条件要等到六年之后，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处于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写信人何维凌在赵紫阳的智囊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那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来自民间，又得到最高权力的支持。对何维凌这样的有政治抱负与主张的理想主义者正是如鱼得水。他的同事回忆说：“何维凌是农村发展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对文化革命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及其根源都有自己的疑问”，“他在这一批人中，常常看得更宽，想得更远。大家研究农村问题，他经常能够跳出农村，把农村和更大的系统，比如跟整个国民经济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考虑”，等等。这当然都是后话，但也说明了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的密切关系，并且深深打上了他们的精神气质的烙印。

其实，我们这里讨论的戎、潘与阎、何的关系，他们因为理想主义走到一起，最终却发现彼此“不是一类人”：这本身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经历了最初的狂热，之后的困惑，到文革后期，许多人都放弃了理想主义；而坚持理想主义的，也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潘和戎说他们成了“个人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回到了人自身，以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为理想，他们依然关心或者脱离不了政治，但又不同程度上疏离政治，并且使自己边缘化，走向文学与艺术，潘和戎都参加了白洋淀文学艺术群，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阎与何依然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做职业革命家，只有从事政治才能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他们，特别是他们中的干部子弟（阎就自称为“正牌干部子弟代表”）钻研理论，到农村、农场劳动，是为了解社会，磨练意志，为条件具备时登上政治舞台做好准备。如研究者所说，他们在文革中“看到权力的至高无上，受到权本位意识的腐蚀影响，文革中一度呼风唤雨的经历，更激发了他们的权力欲望”，“文革运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

¹ 少丁致 pian 书（1970年7月2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39页。

² 孙方明：《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小组》，第146页，第147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11年出版。

阴谋政治对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¹和潘、戎选择边缘化不同，他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处于时代的中心。

这样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但也有相互纠缠的一面：他们毕竟同属理想主义者，而且在文革的总体格局里，都属于文革现实政治的质疑者、批判者，以至反对者，并因此处于受压制的地位，他们也必须相互支持。何、阎未必不知道他们与潘、戎不是一类人，仍然一再表示对和她们的友谊的珍惜，潘、戎对阎、何虽有诸多怀疑与保留，但仍怀有同情的理解，以至尊重，就是这个道理。

（七）飞翔，又“飘然落下”

这是《民间书信》里一封特别的信，写信时间是1969年6月12日，写信人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张育海，此时却是缅甸游击队的战士，这是他在缅甸丛林里写给北京同学的信。

这背后是一段中国红卫兵——知青在困惑中从他们想象中的世界革命里寻求出路的悲壮历史。

1968——1969年间，尽管大部分红卫兵已经成为知青，但许多人依然心存红卫兵情结，还念念不忘“红卫兵运动何处去”的讨论。一批激进的红卫兵就将视线转向了“世界革命”，

如研究者所说，“他们把‘输出革命’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恰当出路”。而且还有这样的具体背景和接连发生的一些事件：“1968年年底，在云南全面展开‘划线’运动，将造反派群众打成‘反革命’，许多红卫兵被关进‘牛棚’。在昆明师大附中的禁闭室里，昆明十中、十二中、女中、十一中等校的红卫兵开始秘密商议：跨过国境线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队。1969年5月14日，一支知青队伍从盈江小平原出发。队伍像滚雪球，经过几番聚散，经过瑞丽双印到达潞西三台山邦滇寨。他们在乡村举行‘纵横谈’，核心议题是：中国红卫兵向何处去？在这次会上，还念了《缅甸共产党党章》，最后决定参加缅共。整个德宏地区边境五县的走串，最终导致了一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加入缅共游击队。据有关部门

¹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34页。

统计，仅1969年6月一个月内，因各种原因参加游击队的红卫兵——知青达三百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少数则属于云南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我们讨论的这封信的写信人张育海就是1968年从北京到云南插队，1969年3月参加缅共游击队的。

这些红卫兵——知青可以说是带着一种“政治幻想”越境参加世界革命的。1969年夏，一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者臧平分），以佚名在北京老红卫兵中广泛流传，以后又传到全国，就充分表现了这一代人的世界革命战争想象：我们“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踏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在最后攻占白宫的战斗中，战友为掩护我，用身体挡住了从角落里射来的子弹：“白宫华丽的台阶上，留下你殷虹的血点斑斑，你的眼睛微笑着，是那样安详坦然”，“看啊！摩天楼顶上，一面赤色的战旗，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火一般的红旗，照亮了你目光灿烂，旗一般红的热血，浸润了你的笑脸”。研究者分析说：“这首诗集中表现了整个红卫兵群体在1968——1969年间的一种心境：冲动，浮躁，渴望奉献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它是红卫兵运动终结时的一种政治梦想，也反映了他们对文革现实环境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和拒绝。尽管整首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美妙憧憬，但从头至尾渗透着悲凉的情绪”。¹

在了解了以上时代与心理背景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张育海的这封非同寻常的书信了。写信人说，他是以一个“和死打交道”的“当兵的”的身份和老同学谈心，“不耐烦说话拐弯”。他说的有三点意思。

首先谈的是自己和知青朋友共同面临的困境：“消沉，痛苦，颓废，堕落，或发疯或自杀，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是许多学生的通病了。确实，十几年的教育，学生成了一些胸怀大志，但又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一旦原来习惯的生活道路走不通，落到从来没有想到的地位，一个物质生活条件、精神生活条件极低，而且远离亲人，远离（现在回想起来更加）

¹ 以上材料和分析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16页，第143——144页。

灿烂的城市和家庭，自然要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不知怎样熬下去，而被单调的生活、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精神分裂！”

而他想强调的，是“千万不要绝望”，“不要太悲观了”。希望、出路在哪里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时事、政治分析（这样的分析在当时知青中是非常普遍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像我国现在的政治状况，必然要从不断的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今天不同于拿破仑那种于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阶级内容完全不同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他因此而认定，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政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于是他又提到了这一代人念念不忘的毛泽东关于“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中国与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讲话，并且说：“我们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的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永远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是要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基于这样的对时代发展方向的估计，就提出自己这一代人，“不是没有机会投入历史潮流”，而是有没有“准备”和“锻炼”，能否掌握主动权的问题。他提到了记不得是人们评价拿破仑，还是拿破仑自己的话：“人，不是幸运特别眷顾他，而是在幸运临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的人”。他要做的，就是这样的能够“把握历史的脉络，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的人。他深知，“天降大任于斯”，就应该以“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这也是文革中流传一时的青年毛泽东用以激励自己的话）的毅力去迎接一切。他走上缅甸战场，就是为顺应世界革命的潮流而作的准备和自觉锻炼。

但张育海更想向北京战友倾诉的，却是自己真正上了战场以后的体验和认识：“战争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成万的吃人的惨剧！”“犯不上用感伤的眼光看，而当然也不能像那些学生那么浪漫地想”。他这样谈到自己亲身感受的战争的残酷：“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外，是微不足道的”，“为了战争的整体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实际上大部分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不一定永远为人怀念”；“军人的字典里是没有‘不’字的，无论多

危险，想冲就得冲。不论你如何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要走。纪律要求这样，环境逼得你这样！否则吃饭的家伙就要搬家。在军队里，最好不要乞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腻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因没有缓冲因素而尖锐无情！”结论有二：“要珍惜和平和幸福”，“不要用玫瑰色的眼光看战争！”最后的告诫是：“不要冒失”，“不要轻易铤而走险”。但也不忘补充一句：“当然战争生活有其非常迷人的一面”。¹

可以说，张育海是在对战争的认识趋于成熟时牺牲的。牺牲时年仅21岁。收信者后来去了缅甸，也牺牲了。这封信却几经传抄而保留了下来。还有一篇某杂志刊登的描述他牺牲时的情景的文字，也收在《民间书信》里，摘抄如下——

游击队已经在这一带三区徘徊了将近一个月。——热带雨林浸泡在由疾病、死亡染黑的阴雨里，到处是瘴气、蚊蝇、毒蛇和蚂蝗。——大部队的脚步声一消逝，伏在草叶上的嗜血的蚂蝗就如急雨似的飒飒地跳跃，而扁蛇（眼镜蛇的一种），常常拦路袭击步行者。最可怖的还是缠在齐肩高的秧青树上的绿牙蛇，它闪电般地攻击穿行的游击战士，往往恰中头部和肩臂，使人倒地立毙。——

那天，缅政府军的火力像一道道烧红的铁栅压了下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要冲锋——

他倏地从地上挺立起来——不像是冲锋，像作一次优雅的跳跃、飞翔——

他飞翔起来的时候，两只臂膀得很开，不知道他是怎样投弹和射击的。在那一两秒钟之内，正面和左侧的敌军火力居然懵了、哑了、沉寂了，像空出了一个舞台。他一个人独占了两军对垒的舞台，他打出了整整一梭子弹。他在疯舞和高歌之后倒下。敌军清醒起来，三挺机枪一齐向他扫射，密集的枪弹将他冲顶起来，然后像一片软软的羽毛飘然落下。

¹ 育海致XX书（1969年6月1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00页，第86页，第97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

张育海的牺牲，究竟是被误导、利用的青春悲剧，还是令人惋惜的为理想的献身？真的说不清楚。但他那“飞翔，又飘然落下”的历史瞬间，却让人永远难忘。

二. 1971——1977年

《民间书信》里收录的1971年书信，仅有三封。但1971年却是知青思想、心灵史的又一个关节点：这一年9月，被1969年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宣布为接班人的林彪出逃，这个事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毛泽东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曾经的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的红卫兵——知青一代人更有天崩地裂的感觉，又经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与反思。于是，就产生了这里要讨论的1972年5月15日一封书信里提出的新动向，新课题——

（八）“我的清理思想的工作仍在进行着”

写信人何志云是一位插队黑龙江的上海知青，他后来回忆写这封信的背景时说：“1972年最大的特点是经历了1971年——那一年林彪折戟沉沙，全国人民就像是昏天黑地做了一场大梦。梦定之后，远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的我们开始有了点独立思考的意识，其实不惟是黑龙江知青，比如这里的两个朋友（按，指收信人），当时一个在黄山，一个却在上海。大气候下年轻人的心大抵是相通的，于是我们就在通信里交流思想，这种交往的朋友那时至少有一二十个”。¹

独立思考的第一步是对自己的思想重新进行一番清理——

“我的清理思想的工作仍在进行着，这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记得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对自己最大的毁灭也就是最好的保存。”思想清理和自我否定，就是我们下文所要讨论的，对红卫兵时代的信念以至的信仰的基石，进行根本的质疑与反思。这样才能走出“思想上的动荡不安和混乱”，进入新的“摸索阶段”。

¹ 何志云：1972年5月15日书信《附记》，《民间书信（1966——1977）》，第183页。

而这样的质疑与反思，又必须建立在寻求新的思想与资源的基础上；何志云回忆说：那时候，他们一起交流“话题只有一个——读书”。在这封信里他就向朋友报告自己“除了《严复传》外，近一个月中，还读了《列宁回忆录》、《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斯大林时代》、《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昨日起开读《西方名著提要》”，“每天早晨一个小时的英语仍然坚持着”。XX在给何志云的回信里，也谈到“每当我脱离了嘈杂的生活，看看书，晚上一个人静静思索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由于接近真理而享受到的莫大幸福，感谢马克思！感谢黑格尔！他们永放光芒的伟大思想照耀着让我思索”。信中还谈到，之所以这样痴迷于读书，是因为“我的良心还不愿意让自己的一生沉睡在蒙昧与麻木之中”，“只有用科学的眼光来分析，才有可能把握住历史的必然，才不至于成为左倾幼稚病或者右倾颓废病的患者”。

这样的读书——自省，就进入了一个“内审诸己”的境界。而且有了新的追求：“乐天一点吧。有时我这样想，人是活生生的，他不应该为着逻辑和理智而活着，谁也为没有权力压迫自己，压迫精神力。自然界创造了我们，就是为了让符合自然地发展”。

在信里，写信人浮想联翩，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吉诃德先生万万没有料到，相隔了几个世纪以后，他的主义竟然在遥远的中国有着那么多的信徒”；“让生活来磨砺我们吧，已经四年了，再过十年、二十年又如何呢？”¹前引何志云的信里，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日后有一天如果要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该怎么动笔？”²这一代人都是带着极强的历史感去读书、思考的。

何志云和他的朋友的通信，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继1968——1969年间之后，在1971——1972年间，知青中掀起了新一轮的读书、讨论的热潮。这是在“重新思考、质疑，再出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在总体倾向上，阅读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从古典哲学（黑格尔、康德、休谟）转向现代哲学（詹姆斯、萨特），从古典文学（车、

¹ 何志云致XX书（1972年5月15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82页，第183页。

² XX致何志云书（1972年8月2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97页，第198页，第199页，第197页。

³ 何志云致XX书（1972年5月15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82页。

别、杜)转向现代文学(萨特,贝克特)”。¹这在这一代人精神发展史上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转变。

(九) 赵振开(北岛):“我——不相信”

研究者告诉我们,知青沙龙在1972年前后进入了鼎盛时期。北京知青的文学圈子,开始发生密切的交叉,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研究者特别提到,四个北京四中的学生,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和赵振开在史康成家聚会,形成“史康成沙龙”。他们与赵一凡沙龙和徐浩渊沙龙中的成员(仲维光、甘铁生等)发生多边的接触和往来,加上一些“二流社”的老朋友,我们前文提到的女师大附中的潘青萍、戎雪兰,以及史宝嘉等,就成了一个连环套式的圈子。研究者介绍说,“这个沙龙集中了一批思想型的知青,他们的目光从理性主义,开始转向经验哲学。虽然这一时期的读书和理论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但是为沙龙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氛围”,而“这个沙龙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其中出现了现代诗歌的代表人物北岛(赵振开)”。²

赵振开当时在北京城建当工人。《民间书信》收入的赵振开最早的书信,是1969年7月8日写给他妹妹珊珊的信。赵振开的弟弟赵振先后来回忆说:“到了1969年,这一代人要建造理想世界的努力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发配的发配,充军的充军,连珊珊也没有逃脱被逐出北京的命运”。³在这样的时刻,赵振开在信中给他妹妹,其实也是给自己,送去了两句话。一句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文革中流传的青年毛泽东的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再一句是鲁迅的话:“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谓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⁴北岛在2008年写过一篇《断章》,谈到当年自己思想的发展有两个关节点:第一次是1970年春,他和曹一凡、史康成同游颐和园,史康成立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

¹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29页。

²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20页,第226页。

³ 赵振先:《怀念珊珊》,收《民间书信(1966—1977)》,第413页。

⁴ 赵振开致珊珊书(1969年7月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04页。

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

在赵振开的感觉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为我的生活打开一道意外的窗户”。打动赵振开的,大概是那正视现实的绝望,又要坚守对未来的希望的复杂情怀吧。第二次是1971年,听到关于“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的中央文件的传达以后,午餐时当着众工友的面,赵振开突然开口,“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谈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一代的精神出路——”,“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一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者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在林彪事件后,萦绕在每一个愿意思考的青年脑海里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赵振开说:“时代,一个多么沉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¹

在这样的思想的铺垫下,就有了我们所要重点讨论的1972年2月18日赵振开写给金波的信。这在《民间书信》里是一封分量很重的信,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在这一代人文革精神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赵振开在信的一开始,就谈到当年“四·三派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无视旧习俗的勇气在我身上也为不必你少”,但接着就坦率承认,“我确实变了,而且我会继续变的”,并且说:“敢于提出并尝试解决生活中新问题的人,使社会日臻完善;而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不过是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而自己正是要“提出并尝试解决生活中的新问题”,“为了这些,再大的代价也为是值得的”。他也正在这里与收信人发生了分歧,“思想上的痕迹已经很明显,而且比我几天前想象的要深得多。这是一个事实,感情是代替不了的。但它并不妨碍

¹ 北岛:《断章》(2008年10月),收《波动》,第226页,第227页,第229页,第230页。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

我们的友谊”，“我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希望你能够保持我们六九年临分离时的求知欲。在这次回京时，我明显地感到，你在这方面逊色了。而到达真理的岛屿必须经过知识的海洋”。¹——这里谈到的，在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新的历史关口，同路人的再次分手，是一个林彪事件以后很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研究者也指出：“读书使沙龙发生了又一轮的分化，一些思想僵化，耐不住读书寂寞的人都成了圈子的外围，尽管他们愤愤不平，但再也无法进入活动的中心。随着时代的淘洗和沉淀，沙龙在1972年后，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新知识、新思想的发现，活跃的文化串联，为沙龙贯注了勃勃生机，为创作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²

因此，赵振开在这封信里对彼此分歧的分析，由此而提出的新思想，显示出的思想发展的新趋向，也许是更重要的。

“你在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你有着‘无限的乐趣’、‘无限的愉快和幸福’。我不否认，这种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你确实是诚心诚意地信仰它。你并不像时时遇到的假道学先生。可是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的，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的乐趣’，‘无限的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我并不是一概否定信仰，人似乎总是需要一种绝对的东西占据自己的灵魂之上。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有信仰，不过在站上之前，我要像考古家扣扣敲敲，把它研究个透彻的”。³

赵振开和金波的分歧，显然不在是坚持理想、信仰，还是放弃理想、信仰，信里说得很清楚，收信人不是高叫理想却并不准备实行的“假道学”（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缺少这样的“假道学”），而是“诚心诚意”的信仰者。可以说，他们都同是理想主义者，不同点在于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理想、信仰，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分歧。赵振开说他“变了”，是因为

¹ 振开致金波书（1972年2月1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61页，第162—163页。

²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27页，

³ 振开致金波书（1972年2月1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62页。

他提出了一个新思想、新问题：要“细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的，它的特性和结实程度”，也就是要用“怀疑精神”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而且是信仰的基石，从根底上进行反省和反思。这自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正像信的一开头所说，在1967、1968年间，即文革的初期，作为“四·三派”红卫兵的战友，赵振开、金波都是具有“理想主义献身精神”的，有过“高昂的激情，战斗的姿态，激扬的文字”，对此，赵振开是珍惜的，因为它“唤醒起来我身上一些特质并增添了一些好的东西”。

但如前引给妹妹的信中所说，他更有鲁迅的精神，“敢于正视现实”。因此他早就从红卫兵向知青、青工身份的转变，感到了“被抛弃”的迷惘与痛苦。林彪事件之所以给他那么大的冲击，就是因为由此看到了理想的虚妄，从而对自己红卫兵时代曾经的信仰的基石，曾经吸引他的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觉得一切要重新开始，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而且这一回，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选择，走自己的路，而不听命于任何宣传和引导。如他自己所说，他并不因此否认理想与信仰，他的虚妄感不会导致虚无主义。但他再也不将自己的选择绝对化，他要重新唤起的怀疑精神贯彻到底，宣布对可能有的新信仰，也要“叩叩敲敲”，自己也就不会停留在某个“终点”，而永远“在路上”。他说自己变了，而且要继续变下去，其实是一个彻底的觉悟。相形之下，收信人依然坚持红卫兵时代的“崇高的理想”，固然精神可佳，但因为缺乏反省，“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而在实质上导致了前引研究者所说的“思想的僵化”。赵振开的批评就更为尖锐：看似“崇高”的坚守，不过是“几百年前”的“苦行僧和清教徒”的重演。

无论怎样，赵振开的这封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林彪事件后，在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一代中，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这在《民间书信》里也有反映。1972年X月17日的一封书信，就这样写道：“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一切不过是宣传，不过是渲染，靠了这种宣传而激起人们一时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绝对不能持久的”，“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永恒的真理，也没有万世千秋一成不变的逻辑”。这些曾经吸引、支配红卫兵的逻辑：

“绝对”、“永恒”、“不变”，现在都变得可疑。质疑更直接指向文革及其基本意识形态：“所谓‘人民革命’、‘人民战争’真的是这样吗？”“我明白了一条可怕的真理：群众不过是工具，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在它的外表却罩上了一道美丽的、金色的光圈——什么‘相信’、‘依靠’——虚伪，虚伪，全是虚伪！”一切最终都要走向反面：“如果文化革命算是发动了群众的话，那么也必将导致自己的掘墓人”。于是，又有了更根本的追问：“我应该怎样地活着？人应该努力奋斗，不应该是为自己的，但也不应该是为全民的”，“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¹

另一封写于1972年5月1日的书信，则借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对作为文革母题的“公与私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公’字是错误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私’”，“共产党的原则是‘先公后私’，并不是完全不要个人，因为整体也要由个人组成”，“英雄人物在他献身的时刻是无私的，但并不是平时生活中没有一点‘私’，英雄的头脑中也是有矛盾的，有‘公’与‘私’的斗争”，“宣传英雄人物的死，总是说重于泰山，哪里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等等。²这一切都表明，林彪事件以后，原来坚如磐石的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石动摇了，人们开始怀疑，开始思考——。

回到赵振开的信：他提出的第二个方面的分歧与问题，也同样重要——

关于农村问题，我的发言权有限。我之所以当时要扯那些，只不过是告诉你：除了你观察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希望你把这些也考察一下。我当时绝非出于“自信”。可你的信中却很自信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们统统分成左中右了事。这不是做算术题，用公式套一套就行了。在这个公式中，正号是“做一点有益工作”的“革命者”，负号是“站在一旁”的“慈善家”，我不希望用公式化的语言来讨论问题。³

¹ 路谊致孙海书（1972年X月1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12页，第213页。

² 华华致红军书（1972年5月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72页。

³ 振开致金波书（1972年2月1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62页。

这里所说的“公式化”的思维与语言，恐怕是更根本的。这表明，赵振开这样的青年一代中的思想者，对文革与现实的质疑，已经由意识形态、观念方面，进入了思维方式与语言方式的层面。如研究者所说，“要跳出文革意识形态的怪圈，只有重新搜寻、发现新语汇和重建叙事结构。如果不能破解文革的一套话语，人们就永远只能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奴隶”。¹不仅在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在思维与语言的层面进行质疑，反抗，以达到思想观念、思维、语言的全面的新创造，新自觉，就成为文革后期摆在年轻一代面前的新课题，新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怀疑主义思潮的兴起，思维与语言的反叛要求，以及我们在下文会有讨论的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下，沙龙里的青年把目光转向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学、艺术，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研究者评论说：“由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唯一现存的文明，沙龙现代主义诗歌对语言的猥亵和践踏，反文化，反社会，成为文化再造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破坏和颠覆，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拒斥和超越。反文化浪潮的出现，是文革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这种对语言的颠覆行动，为知青集团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开辟了道路”。²

知青沙龙是通过读书接触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学的。很多人都回忆到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克茹亚克的《在路上》等对他们的影响。³白洋淀诗人念念不忘的是，他们当年搜寻外国现代诗歌的艰辛与快乐：据说“文革前译介的西方现代诗很少，经过文革焚书，西方现代诗就更是物以稀为贵了”，“多多把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中外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这个大本曾在朋友中间传阅，给大家很大启发。林莽回忆说当时在白洋淀流传的译诗比北京沙龙还多。他在1971年借到了洛尔迦诗集，并看到了戴望舒的《雨巷》。芒克说，他在1972年读到了洛尔迦、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在白洋淀流传的诗歌还有：聂鲁达、阿拉贡、聂

¹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19页。

²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19页。

³ 参看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13页，第7—10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

利亚以及方平译的十四行诗。其中洛尔迦、聂鲁达对白洋淀诗群产生了重要影响”。¹

我们已经谈到了白洋淀诗人群。据有关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前的徐浩渊沙龙里的创作，其代表性诗人有被称为“形式革命第一人”的伊群、孙康、谭小春等。而真正“刮起现代主义诗歌旋风”，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白洋淀诗人群在1972年以后的创作，这显然和前文所讨论的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的思想文化和人们精神的大震荡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其代表性诗人有：岳重（根子），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张建中（林莽）等。研究者评论说，“岳重首先发现了文革语言的无意义，对语义本身产生了怀疑。他在《三月与末日》（1972年）中故意颠倒语义（如大地，春天），虽然是对社会文化的反动，也包含有对语言本身的怨愤，语言成为文革政治的替罪品。摧毁语言的行动，反而激活了死亡的语言”。多多《青春》（1973）、《无题》（1974）等诗作的诗句“是出色的直觉和清醒的绝望两者的混合体，在白洋淀诗群中最具有现代意味”。“芒克对意识形态一直怀着超然的态度。他的诗歌洋溢着自然、不羁的性格”。林莽的《26个音符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岁月》写出了他的黑暗感觉，“抱着绝望的心情”写下他的这首写于“1974年夏——冬”的诗，原题是《纪念碑》。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新一代诗人“独立创造属于自己的崭新话语”的努力，“知青群体在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家园之后，便有能力拒绝加入文革社会主流文化中去了”。²

赵振开不是白洋淀的知青，但那里有许多老朋友。1973年春，他和史宝嘉等来白洋淀，在此之前，甘铁生、江河（于友泽）等诗友也来过，实际上形成一个现代派诗人群。赵振开这一回见到了以后在《今天》时代的主要伙伴的芒克。据说“芒克这一笔名是赵振开给的：芒克的外号：猴子，英文是：Mon-Key，中文音为：芒克。北岛这一笔名是芒克为赵振开取的，意为北京，孤独的岛”。³以后，北岛就成为文革后期现代派诗人群的主要代表，他写于1973年的《告诉你吧，世界》（后改题为《回答》）也被视为一篇主要代表作——

¹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39——240页。

²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40页，第242页，第244页，第245页，第241页。

³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48页。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¹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并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¹ 此节诗在1978年《今天》第1期发表时，改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吗，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¹

这思想、观念、思维和语言，确实属于那个时代的觉醒了的反叛者、质疑者、挑战者。

我们还要补充的，进行反叛、质疑与挑战的，不仅是诗人，还有艺术家。实际上当时的知青沙龙里聚集的，不仅是诗歌、文学的爱好者，还有迷恋于戏剧、绘画、音乐的。当白洋淀诗人群到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寻找新的思维、语言的同时，也有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到现代主义艺术（绘画、戏剧、音乐）寻找资源。早在1968——1971年间，徐浩渊沙龙里，就形成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浓厚兴趣。研究者介绍说：“尤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塞尚、德迦等人后期印象派绘画，以及《自新大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交响曲》等西方音乐，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为世人所熟知的西方写实名画、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都被视为甜俗，而被他们所厌倦”。

1972年，又一批学习绘画的知青在北京铁路一中学生鲁燕生、鲁双芹家汇集。在1972——1973年间先后举行了两次具有现代主义先锋性质的沙龙画展，在北京沙龙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²

在《民间书信》里，也有两篇书信专门讨论艺术问题。一篇写于1974年的信，谈的是“艺术家的力量”：“有人说我们追求的东西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想象的力量”，

¹ 北岛：《回答》，收《北岛诗歌》，第7页，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

²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31页，第221页。

“而艺术家的力量就在于他的思想和灵魂能够跨越天然或人为的束缚、人们精神世界的天堑，自由地享受到自然赋予人类的那种永恒的种种美的因素，诸如大地的一切花草、馥郁的微风、海洋的无涯、森林的喧哗、爱情的痛苦、儿童的咿呀声——并通过自己的特殊的力量（天才）把人们对美的渴望和生活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¹1975年5月的这封信则大谈“人类的异化”、“异化了的艺术”，“纯艺术”与“社会意义上的艺术”，以及“有没有共同的人性？”²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的力量”命题的提出，这同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内容。研究者指出，“文革是这样一个时代：思想资源匮乏，政治错谬百出，信息极端封闭，在理论的道路，布满了陷阱和歧途，要想通过理论方式找到方向和道路，是异常困难的。对于缺乏理论基础的一代人，思考常常将他们带入更深的困惑”。这就是说，文革的文化贫乏、思想僵化与控制都达到了极致，“运用现有的词汇和逻辑进行理性的思维，是不可能的”，而且极容易落入迷途。这样，非理性的力量，艺术的感悟，直觉，经验，想象，反而有可能“窥破理论的掩盖，发现生活的真相，接触到真理”。白洋淀诗人岳重在一首诗里，就这样写道：“大脑 已经死了，被你累死的。 眼睛 将带领我前进”，要用自己的眼睛，直观地感受、感觉、把握世界，并大声疾呼：“我 绝不思考！ 绝不思考！”³另一位白洋淀诗人宋海泉也谈到，他们如何摆脱文革前后的教育强加于自己的“永恒，完美的理念世界”的束缚，重新确立了“感性的实在性、丰富性”，从而获得了“注重感性及个人体验”的新思维，新语言。⁴可以说，这一代新的艺术家正是用艺术思维和艺术语言，来取代文革政治语言和理论思维，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立地把握世界与表达的方式。

这样，在文革的中、后期许多知青通过从政治向文学艺术的转向，重新寻找自己，尽管仍然充满迷惘，但却在这一代人的精神成长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些文学、艺术新人的成就，都已经进入了当代文学史、艺术史的叙述，但其思想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却

¹ 王贻骏致谢亚力书（1974年8月14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81页。

² 米尔致向明书（1975年5月26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28页，第329页，第330页，第331页。

³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36页。

⁴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261页。

未能得到足够的体认，我们这里也只能提出问题，更深入充分的讨论，还有待以后的研究。

最后，我们还要回到赵振开当年的书信。在《民间书信》里，收入的第三封信写于1976年8月，是写给沙龙里的老友史宝嘉的。劈头就说：“珊珊死了，我最爱的妹妹死了”。我们早已从1969年第一封写给妹妹的信里感受到他们的兄妹情深。后来珊珊作为干校知青在1972年分配到湖北一个县的工厂，却于1976年因为抢救一位落水的女孩，自己被河水吞噬。赵振开在信中说：“我赶到她失事的地方，把白色的野花洒在河上，轻轻呼唤她的名字，她没有回答，她正像安葬她的那条河那样明朗、宁静，她用死否定了那个恰恰相反的世界——”。妹妹死了，赵振开还活着，他还必须继续面对这个“恰恰相反的世界”。他写诗，同时写小说，都是要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追问。他决定将自己写于1974年、1976年刚刚改了第二稿的中篇小说《波动》献给妹妹，1980年自制《波动》油印本时署名就是“艾珊”。这里，不准备全面论述这部文革中难得的小说，只想讨论其中一点：小说有大量的对话，而女主人公萧凌（一位“有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女青年）不断地向她的谈话对手，主要是男主人公杨讯（“一个典型的干部子弟”）提出各种疑问，从而使小说笼罩了相当浓重的怀疑主义的氛围。

有研究者因此批评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小资情调没有拉开一个必要的距离，缺少一个独立的批评和审视”。¹或许是这样吧：赵振开实际上是将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也包括他自己）的疑问和困惑部分地写进了萧凌的对话与独白里，这并不妨碍萧凌这一文学形象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萧凌当然不是作者自己。但下面这些对话却传达出某些时代思潮的信息：

“请告诉我，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比如，祖国”。

“哼，陈词滥调”。

“不，这不是个用烂了的政治名词，而是我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

¹ 振开致保嘉书（1976年8月1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411页。

² 李陀：《序》，《波动》第40页。

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

“责任？你说的是什么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的责任呢，还是什么？”

“需要的话，就是这种责任”。

“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

还有关于梦——

“咱们这一代人的梦太久了，总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会发现准有另一场噩梦在等着你”。

“为什么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呢？”

“你呀，总在强迫自己相信什么，祖国啦，责任啦，希望啦，那些漂亮的棒棒糖总是拽着你往前走，直到撞上一堵高墙为止——”。

“你也并没有看到结局。”

“是的，我在等待着结局，不管怎么样，我总得看着，这就是我活下来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世界添一点儿光辉，另一种人是在上面抓几道伤痕。你大概属于前者；我嘛，属于后者——”。

还有关于意义——

“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到处都是落满灰尘的道具，甚至连人们都成了道具的一部分——”。¹

¹ 北岛：《波动》，第68—69页，第73页，第76页。

这里反映的思想的疑惑无疑是真实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今天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的思潮，并且和当代（九十年代以后）的虚无主义思潮联系起来，认为萧凌是当代虚无主义者的“前辈”。¹这里或许有一个误会：从表面上看，对一切（祖国、责任、理想、希望、意义）都不相信，似乎是一种虚无主义；但如果仔细考察具体的语境，就不难看清，其所不相信的是：“不是我的”祖国，“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作为“漂亮的棒棒糖”的理想、希望，是“道具者”的意义，其本质是对被垄断与曲解的“祖国、责任、理想、希望、意义”的拒绝和反抗，其所针对的，是曾长期强制灌输给这一代人，文革期间又达于极端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和前文引述的北岛的《回答》里所说“我——不相信”是同一意思，是这一时期的怀疑主义思潮的表现，和九十年代以后的虚无主义思潮是有着不同背景与意义的。

北岛在《波动》的三联版里强调自己和这一代是“有使命感的人”，是“必然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的。²因此，他们即使有虚妄感，也不会引向虚无主义，他们的怀疑、虚妄感是和理想主义相反相成的，只会导致不断的抗争。北岛在《回答》里，最后把自己归结为一个“挑战者”，依然期待着“新的转机”就表明了这一点。

（十）赵一凡留存的书信

北岛在回顾自己的文革经历的《断章》里，谈到写完《波动》考虑如何收藏保存时，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³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永远忘不了的是北京朝内前拐棒胡同11号大杂院后院角落里的那间小屋，以及它的主人：身患残疾，却整天忙着接待各种各样的访客，和他们忘情地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生；同时又忙着整理从各处收集来的大字报、小报、传单，以及当时难得一觅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

¹ 李陀：《序言》，《波动》，第20—21页，第18页。

² 北岛：《三联版小序》，《波动》，第1页。

³ 北岛：《断章》，收《波动》，第235页。

十年如一日。他的至友徐晓多年后回忆说：“我不知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¹对于北京知青沙龙的年轻人来说，赵一凡是他们“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徐晓语），新思想资源（地下读物）的提供者，以及他们的最初的造物（地下文学作品）的收集、保存者。

更重要的是，他成了人们所说的“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新人”的坚强后盾。据当事人徐晓介绍，“‘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上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者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作者为普通人的自私辩护，但并没有以此作为真理的栖息地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正好成为具有怀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与同时代人遇罗克这类英雄相比，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

‘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永远的五月》）”。²而赵一凡自己，一方面，他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怎么办》一书就是他推荐给徐晓的；而且他也身体力行“合理的利己主义”：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与幸福，这是他的不遗余力为他人服务，保护新人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赵一凡又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不动摇，对于党，他既反叛又归顺。这就将他和他影响下的“新人”

¹ 徐晓：《无题往事》，收《半生为人》，第062页，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² 徐晓：《自序》，《半生为人》，第XXLV页，XXV页。

区别开来，徐晓坦言，如何理解一凡的“执著”而“单纯”的“正统”，“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但却又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尊敬与挚爱。¹赵一凡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信仰者，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不可复制的历史人物。

在我们所讨论的文革民间书信里，赵一凡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有一个辐射到全国各地的书信圈子，在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赵一凡因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案”而被捕，从他那间小屋里就抄出来往信件 889 件。²他保存的这些书信，连同他辛苦收集的文革资料，在他去世以后，因为一个偶然原因大部分被毁，徐晓从残余物中找出了十多封书信，就成为她主编的这本《民间书信》里最珍贵的部分。也如徐晓所说，赵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怪杰荟萃的大本营”，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思想斑驳，意见纷纭，甚至相互抵牾，但也正为我们的讨论那个时代知青的精神发展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本。

收入《民间书信》的第一封书信是 1967 年 11 月 2 日，也就是文革初期，赵一凡写给他的圈子里的一个叫俊霞的朋友的母亲的书信，因此也就有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气息，一开始就交代家庭出身：“我父亲叫赵平生，出身贫农，大革命（1925 年）入党，1942 年前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是职业革命者，曾多次被通缉，三次被捕坐牢”，“现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直属部委之一）工作，是机关第二号‘当权派’”。接着介绍自己的历史：3 岁时在逃难中患脊椎结核，卧床六年才愈；13 岁随父转战东北旧病复发；15 岁病又加重，致下半身瘫痪；八年后，身体好转，于次年（1959 年）在一个出版社担任编辑，因劳累过度，又把身体搞坏，于 1963 年回家养病至今。文革开始时，是东城区学生休养团支部书记。俊霞就是他在团支部工作时认识的，很快就发现这位革命烈士的子女“缺乏那种对旧社会的切肤之恨和对新社会深情的爱，所以她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也就缺乏这种强烈的阶级感情”，“我想唯一的办法是启发提高她的阶级觉悟”。写信的目的，就是要请俊霞的母亲，来给团支部的同志介绍俊霞父亲的革命斗争事迹，“这对于我们后来人是一种极大的阶级教

¹ 徐晓：《无题往事》，《半生为人》，第 076 页，第 079 页。

²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 284 页，第 289 页。

³ 徐晓：《无题往事》，《半生为人》，第 068 页。

育，我希望让俊霞能够牢记过去的苦难，在思想、生活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继承伯父的遗志”云云。这是典型的那个时代团支部书记的口吻，观念与行为方式都是正统的。但在信结束后，又特意加上一句：“这封信您最好不要给弟妹们看，因为我在信中过分地议论了俊霞的一些缺点，弟妹们若看了，会有损于俊霞在弟妹心目中的形象，而使得他们不敬重大姐。那就不好了”。¹这里透露出的对批评对象的尊重、善意，处处为他人着想，就显得革命性不足，有点“小资味”了。但这或许是更能显示赵一凡的本性的。

第二封信已经写于1970年了。这是来自一位朋友的批评：“你帮纪壮（按，大概也是年轻朋友）放大主席生活照片，我认为不严肃。特别是他当着这么多人随便撕毁主席照片，把这种照片和其他作品同视，‘我从来不留不理想作品’。真是太气人。纪壮印制毛主席像，完全是为了出风头，图新鲜，炫耀自己，像其它一时流行的东西一样”，他家里“唱片大批，中外、黄红样样俱全”，“就是玩”，摆弄毛主席像，“也是他的一种‘爱好’，一种‘玩’的内容，你为什么能容忍这种对毛主席的态度？！”最后发出劝告：“不要你什么人都交往，分门别类，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心的朋友也算一等”，“我们这样的青年，常常有投入阶级搏斗决心，而没有实际经验，阶级斗争就在身旁，一定要慎重。我也劝你不要干那些违法的事，免得被人利用。热爱毛主席，遵守毛主席发出的各项指示，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都是统一的，否则有好的愿望，也会出现坏的效果”。²不管怎样，态度是诚恳的，善意的。大概就是这诚恳与善意感动了赵一凡，把这封信保存了下来。

这是一封赵一凡抄录并且保存的，没有署名，收信人也用XX代替，不知具体写作时间，仅知道是从北京寄到成都的信。信中谈到“列车是一所社会学校，我结识了一些为生涯重压所喘息的人们”。信里讲了三个流浪者的故事——

“我的邻座是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他读过几乎我所知道的一切中国、外国小说和

¹ 一凡致伯母书（1967年11月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3页，第24页，第26页，第27页，第28页。

² 付致一凡书（1970年2月2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30—131页。

诗，他有一个不坏的嗓子”，“谈起文化大革命，他是新疆红二司的，曾被戳一刀，一只手骨折，后来找了两个人，报了仇，压断了那个人的腿。一派掌权，他只有流浪在外”。“他又给我谈起了他的生活，他今年28岁，还是光棍一条”，在年轻时候，和一位医生的女儿要好，医生夫妇也赏识他的学识、人品。但当知道了他们的女儿在追求他时，就双双来找他，流着泪求他不要爱他们的女儿。他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不能让女儿的命运和一个前途没有保障的人联在一起。最后，他离去了，她结婚了，有了一个小孩。“在一个深夜，他又回到山城，悄悄走近灯火辉煌的窗户，看见了她，她的丈夫和孩子。多少往事和旧日的深情又浮上心头，他在窗外独自徘徊了一夜——”。

“还有一个，也是在火车上结识的。他和” 同伴们又唱又叫又笑，引来了一位姑娘的注目。她设法和他坐在一起，在到乌鲁木齐的火车上，他们谈了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睛”。当时她在北京工作，他在军垦农场卖苦力。最后姑娘提出要调到乌市来，和他做朋友。“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热情真诚的姑娘，但他拒绝了和她的来往”，因为他深知自己这样的人不能给他深爱的姑娘带来幸福。

“谈到这里，他在纸上写了一个名字和工作地址，叫我有机会回北京时一定千万替他打听她。今年她也有二十六七岁了，可能结婚了，请我看看她的生活怎样，并带去他的问候”。他现在被生活逼得没有出路，到林区去伐过木，到工地挖过土方，搞过投机倒把。最近刚在甘肃被捆了一绳子，在农民的帮助下离开了。现在准备筹一笔钱，买一张大锯，去开木板，作为他较长时期的基本职业”。在谈话中，还透露出“对于人民的贫困、新阶级的压迫，他有惊人的敏感，他了解四川、甘肃、贵州、河北、河南的农村、农民的生活，由于共同的命运，他对他们寄予深刻的同情”。

于是，他又讲了一个故事——

在郑州车站，一个年轻的朴实忠厚的小伙子见到每一位候车人都连磕响头，伸出双手

乞讨。到一个干部的面前，不仅不给一分钱，竟抬起脚来，狠狠照头就是一脚。“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揪住了那个混蛋，讲穷人的高贵，讲富者的卑贱，连骂带讲，那个干部被他弄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狼狈不堪，淹没在人民的愤怒之中”。

写信人因此而发出感慨：“像他这样一个造反者——流亡者——苦力——投机倒把者，尝尽了人生的艰辛，受尽了命运的折磨，但还保持着一颗纯真美好的心灵！”信的最后说：“在你的面前，不管有多少忧伤，我从未挥过一滴眼泪，但走在劳动者的穷困和辛酸面前，我实在闸不住这感情的圣水——”。¹

这封信大概也让赵一凡深受触动：它揭示了文革人生世界的另一面，是通常的文革叙述中很难见到的。赵一凡敏感到它的价值，就抄录并保存了下来。

这已经是写在1972年的书信，是特殊时代一封特别的情书：“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同时眼睁睁地看着而无法帮她摆脱困境，那内心的绞痛是无法形容的”。按写信人的描述，他所钟爱的这位收信人“是一个在这政治漩涡不幸沉溺的牺牲品”：“正常的生活乐趣，您得不到之后，您以一种病态的心理，来寻求生活的乐趣，您甚至于偶然以捉弄男性为快，这是一种报复性的快感。您是在爱情的游戏里生存的，所以我不能不为您时时感到担心。无论您对我像对别的男人那样，虚心假意也罢，欺骗玩弄也罢，我决不会说您坏。对您我只能永远的同情，永远为您心疼不止，永远愿意帮助您摆脱困境。所以时至今，事情虽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实在无法得到您，您对我的态度虽那样，但我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不仅不后悔，反而觉得很歉疚，我恨我给您给得不够，而且太少”。但他还保留了对人性的希望：“生活的残酷，使很多人丧失了人性，您虽然显示了冷酷，然而我想您还不至于丧失人性”。他对她最后的请求是：“我想知道您是否曾经爱过我？”“您是否愿意对我表示亲切些而去掉我的姓，而称我的名呢？——”。这是一封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的信，如同写信人一直想追问：“是什么力量使您离开我？是什么力量使您变成这样？您的未来将会是

¹ 致XX书（写信人与时间均不详）《民间书信（1966——1977）》，第151页，第152页，第153页。

怎样的呢？——”，¹今天的读者大概也要问：是什么样的“政治漩涡”使得人变得如此冷酷，最纯洁的爱情也会如此扭曲？那个时代，政治究竟怎样影响与支配人的感情，包括爱情？当然，也还有写信人的叙述有没有他的主观性，与收信人的真实情况有没有差异？收信人能接受他信中反复说到的“同情”与“帮助”吗？他和她，以及同样在政治、情感、爱情中挣扎的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命运，究竟怎样？哪些是我们知道，或许能理解，哪些是我们不知道，不理解的呢？

赵一凡保存的1972年的几封信，就充满了更多的疑问。一位在矿上做工的朋友来信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想根本是不可能清楚的，许多事情感到非然（按，原文如此）。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对运动一次比一次淡漠，而打扑克之风又是一天比一天盛行。规模之大，波及之广，实在是以往所想象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在书堆中自得其乐，还是随其大流任之发展？还是参加到火热的‘与人奋斗’之中去呢？我在其中能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信中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资产阶级可能篡社会主义国家的权，而资本主义却不能和平演进到社会主义呢？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不怕无产阶级宣传舆论呢？马列、毛主席著作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任意出售说明什么？是想说明他们的统治根深蒂固吗？”这其实就是对文革中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反向思考。²4月一封来自内蒙古草原的来信则谈到“我在读‘厌恶——’（指萨特的《厌恶及其它》）我觉得比以往都更了解其中的寓意，只是有许多东西我表达不出来”，“我比以往更重视‘厌恶——’在自己身上的影响，但我仍不觉得自己了解萨特的东西”。³5月的来信也谈到自己“开始对哲学有兴趣了”，希望“以后再见面时最好给我讲点儿基础的哲学道理、逻辑原理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于是，就提出了“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疑问：“我不明白，人为什么需要一个经过一个修饰的堂皇的生活意义呢？生活太简单了，仅仅就是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呗。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伟大的，不需要再在概念上赋予他伟大”，“撕掉所有自欺

¹ L.T.Yay 致 XX 书（1972年1月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57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60页。

² 于首三致一凡书（1972年4月25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68页，第179页。

³ 叶晓致一凡书（1972年4月29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70页。

欺人的词汇游戏，生活的意义就是现在那里。即使那时，你也未必觉得它不可爱”。最后谈到“我越来越不明晰的是自己。你看我对将来无所期待，对现在不理解，对过去不留恋，再说下去我还不得哭出来？可是又不打算死，那与我也不相干。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人懂吗？太不清晰”。¹这里对“经过修饰的堂皇的生活意义”的怀疑，对“撕掉所有自欺欺人的词汇游戏”的强烈意愿，都显示了新的觉醒。对自己的“不明晰”状态的不满，更是渴求着新的突破。而另一封信又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政治和根本体制问题：“苏联有些高薪阶层，存在特权。而我国呢，有没有这种现象？”“资本主义在我国还应不应该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我国的民主又是怎样呢？能否代表广大人民利益？领导有自知之明还可，而如果遇到一个官僚主义者或者强权主义者，人民便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没有一个能够监督和制止不良现象出现和泛滥的机构存在。以前监委有多大职能？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可以防修的权力机构？”²如此多的疑问集中出现在1972年，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我们在前文所讨论的林彪事件之后，怀疑主义思潮兴起的反映和表现，人们正在从文革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控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了新的独立思考。

赵一凡特地保留的1972年的另一封书信，则表示着随着人们开始独立思考，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出现了新的充满自信的“强人”：“我不拾他人牙慧，我高兴探索。——我是不会失败的，因为我是强者，即使失败，也是失败的强者。这一点也不自命不凡，一点也不傲”。这样的强者有极强的独立自主性：“我高兴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你对我的态度和存心和我有什么相干呢？”“你可以按你的思想生活，别人也同样可以。这就和我高兴按自己的方法生活一样。我喜欢谁可以爱谁，我恨谁可以仇视他”，“我不善于用一般道德观念来决定一个人。何况我从不插手涉及到一个人的命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愿望，达到这个愿望的每个人将采取不同的手段。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还有一个‘人’最根本的观念与水准，不要太轻视它了”。这样的强者是自信又有自知之明的：“人需要自信，否则也太无分量了，

¹ 路谊致一凡书（1972年5月3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75页，第176页。

² 首三致一凡书（1972年11月23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10页。

不过是过多的自信导致过多的错误”，“我劝你不必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对人无恶心，我并不是没有恶的存在。我能赤裸裸地剖视别人，更能为此剖视自己”。¹这样的“强者”的公开宣言，可以看作是建立个人主体性的自觉努力，是对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盲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个外在权威的奴性的一个历史的反拨。这是林彪事件以后在相当部分的年轻人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思潮：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²它是与前述怀疑主义思潮相互补充的，对知青这一代精神的成长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1973年留存的书信有两封。第一封依然在谈论“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东西在束缚青年人，我一定要挣断这思想上的枷锁”，“人世间有许多不平，社会上有许多黑暗面，才使得我们有决心去改造这世界”，并且讨论“历史的理想主义，总不如现实的历史，如果不这样，社会就不能前进了”。信的最后还抄录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做个什么？在我心里徘徊，它是一个鬼怪——”。³而写于1973年秋的第二封信，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信息：“我正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却没有权利选择。个人确是太渺小了，比之强悍的权力，实可谓微不足道。但是，我又坚信，这种强权是暂时的，人类必经一次大的变动（也许不在十年之内，即上升时期），或大的变革，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如今的社会在变，在改变一切‘不合理’制度意识（当然有些的确不合理），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最根本最彻底的变革。终于，这种强权崩溃了，灭亡了，正如资本家教会了工人使用机器却不能阻止工人拿起武器埋葬资本家，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必然，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解放后的社会制度完全是旧社会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只对以前做了一些改革，也许有些是根本性，但是，中国若要真正强大，改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一次巨变。但这种巨变是我们不能估计到的，正如前人（马克思）不能估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历史的情景一样，只能预见”。这段话表明，到了1974年，也即文革的最后阶段，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中最敏感

¹XX致XX书（1972年5月6日），《民间书信（1988——1977）》，第178页，第179页。

²在收入《民间书信》的1974年7月27日的一封信里，就明确提出：“我极为尊重个性，要求个性解放，束缚个性的结果只能造成生产力的停滞”。见王贻俊致谢亚力书，《民间书信（1966——1977）》，第275——276页。

³洛夫致一凡书（1973年3月3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21页，第222页。

者，开始预见到，一次“最根本最彻底”的历史巨变，已经临近，文革中达到极点的“强权”也将“崩溃”，也就是说，文革的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谁也无法估计将由什么力量，在什么历史契机，以什么方式，来结束这段历史，以后的中国又将走向何处；特别是作为“没有权利选择”的个人，尽管可以预见巨变的发生，却无法尽力，这种无力感是写信人路谊和他的朋友最感沮丧与痛苦的。但他们并不消极，仍然努力对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提出自己的设想。

写信人提出了三个主张，一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国家都要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二是“具体按什么路发展，按什么体系组成，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三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能改造大自然，能够创出一个新世界，能够改造旧世界”。写信人说他这是“想入非非”，¹其实是一种新思路的开拓，并且为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证实。在此前后，许多有思想的年轻人都和路谊一样，已经意识到中国和自己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并为“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提出种种设想。收入《民间书信》的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卢叔宁写于1972年、1973年的两封信，就提出了要“进行更深刻、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²以及“消灭特权，提高人民的权力”的改革目标。³我们另有专文讨论，⁴这里就不多说了。

可以看出，赵一凡圈子里的书信往来与讨论，是逐渐深入的。特别是1972年以来，这种讨论就越来越具有反思文革的政治性。这同时也就增加了其危险性。这样密集的全中国范围的通信本身就会引起当局的注意，是随时可能出事的。

（十一）“第四国际反革命案”的前前后后

收入《民间书信》的1974年12月19日的一封信里，写信人突然冒出一句话：“你还

¹ 路谊致一凡书（1973年秋），《民间书信（1966—1977）》，第247页，第248页、

² 卢叔宁致志桢书（1972年11月1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02页。

³ 卢叔宁致丁东书（1973年4月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30页。

⁴ 参看钱理群：《思想史上的幸存者与失踪者——读卢叔宁〈劫灰残篇〉》。

经常写诗吗？多给我寄点来，但要注意，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乱扔，最好烧掉，这样才安全。我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写”。¹

这样的不安全感是自有缘由的。研究者告诉我们，正是在1974年的秋天，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同时，姚文元下令对地下文学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清查。北京各工厂、企业和街道传达公安局的通知，凡收藏有手抄本的必须一律上交，逾期藏匿不交的将进行严肃处理。各地公安机关还对一些可疑人物进行排队摸底、审查与询问。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工厂单位进行点滴不漏的排队检查，许多民间沙龙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

在这样的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首先波及的是白洋淀诗人群。根子、江河都被公安局、派出所和工厂保卫科叫去询问、审查。江河在一连审了十几天以后，就停止了写作，把诗稿分散藏在同学家里，并剃了光头准备坐牢。他还找到林莽，要他把抄写的诗歌都找出来烧掉。在江河走后的当晚，林莽也匆匆烧掉了一批自己在白洋淀时期的作品。与此同时，根子的问题牵连到多多，他也找到宋海泉，要走了自己的诗稿并销毁。在大规模查抄中，徐浩渊的弟弟徐小天被捕，家也被搜查。甘铁生听到消息，立即烧毁了他的一批作品。一时间，风声鹤唳，大量民间诗作毁于一旦。²

前引1974年12月19日的书信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写出的。而且就在四十天后，1975年1月28日深夜12点，赵一凡和其余在京的十几人同时被捕入狱，罪名是组织“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签署的逮捕证，俨然一个国家级的大案、要案。³事后查清楚，这完全是一个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冤案，起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中无意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因为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查”。⁴赵一凡大概是被视为主犯，为了取得罪证，连夜抄家，抄出：来往信件889件；微缩保存的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照片底片46张，照片底

¹ 王贻俊致谢亚力书（1974年12月19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94页。

²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83页。

³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85页。

⁴ 徐晓：《幸存者的不幸》，《半生为人》，第119页。

片一盒，文字照片 53 张；影集一本，照片 303 张；手稿 59 份，零散手稿 450 页；油印材料 487 页，文化革命的各种印刷品 7 捆（其中一捆已经装订成册），内部文件一捆，内部刊物 3 捆，中央首长讲话 2 捆，文革小报 7 捆；还有成本的讨论提纲、调查提纲、学习札记、农村问题研究等资料，以及红卫兵图章、自制油印刮板、复写纸等。全部材料装了两辆小卡车”。¹

这些材料其实是民间沙龙活跃的阅读、写作、调查、讨论活动的真实记录，这或许是当局制造假案，大肆搜查的真正目的所在：要从根本上扼杀民间的独立思考与群体活动。

而且，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抓捕行动迅速由北京扩大全国范围。据和赵一凡同时被捕的徐晓后来说，这个大案，有一种说法，是有三条线索：“一条线索从北京的 Z 到 W 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不相识的无辜者”。²

实际牵涉的人更多。赵振开并不知道他们出事，在 2 月初的一天，骑车来看赵一凡，立刻被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一把抓住。第二天他所在工地就宣布将其送到班组监督劳动。赵振开多年后回忆说：“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是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³制造这无所不在的恐惧，大概也是维护已经出现危机的文革专政的需要吧。

而且还要把专政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就有了《民间书信》里最触目惊心的这封信：1975 年 2 月 13 日赵一凡的父亲赵平生给他所在单位文字改革委员会党支部写信，“书面报告我儿子赵一凡被捕审查和我对他教育不够的问题”。首先表态：“我是共产党员，对于犯有反革命性质罪行的儿子，当然要和他划清界限”，然后表示：“儿子犯罪，我是有责

¹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 289 页。

² 徐晓：《幸存者的不幸》，《半生为人》，第 119 页。

³ 北岛：《断章》，收《波动》，第 236 页，第 237 页，第 238 页。

任的”。不知道这是赵一凡的父亲主动所为，还是出于组织上的命令，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不仅按照阶级斗争的既定路线，随意定人罪名，而且要把阶级斗争的逻辑贯彻到家庭内部，挑战人的伦理底线，强迫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相互伤害。但这也是最能显示文革发展到极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并且内含着一种反人性的残酷性。

不过，人们也从其父亲的交代里多少了解了赵一凡的成长过程：从三岁患病“在六年之久的睡石膏床时期，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各种小说。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四卷本《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加以宣扬传为美谈。实则这六年里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以后他上学在劳动课上突然受伤，“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文艺小说。他找到新旧、中外的小说都看，也学会了俄语。他12岁时，还写了一本《新少年故事》，在大连光华书局出版，我听了还高兴呢。其实，这十年是赵一凡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¹去掉交代书必有的上纲上线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这类的帽子，不难看出，赵一凡是在与病魔的抗争中自学成才的，他的成长的关键，正是在两个十年里，大量阅读了“新旧、中外”的书籍，即所谓“封（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作品，实际是接受了人类文明的直接熏陶，这恰好是对前述反人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抵御，从而形成了赵一凡人性的善良、宽厚，纯粹与天真，这是每一个人和他接触的人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的，也是在文革的人性大破坏的环境下，他能够吸引这么多年青人的原因。当然，他主要是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形成了他的书生气，这大概也是他固执地坚守他认定的理想的原因所在吧。

我们还是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经过近两年的审查，也无法将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定罪，于是，就于1976年12月23日，以其“对王XX发展孔XX参加反革命组织，知情未举；与他人交换反动观点，搜集、扩散反动文章”为由，将赵一凡定为“严重政治错误，教育释放”。这就是说，即使证据不足，你也是有错误的；抓你，放你，都是对的：

¹ 赵平生致文改会党支部书（1975年2月13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03页，第305页，第304页。

这大概也是专政逻辑吧。因此，赵一凡的真正平反，要到1978年12月。¹但徐晓回忆说，赵一凡和徐晓等北京“要犯”在1976年“教育释放”了，而受他们牵连的山西的张珉、赵凤岐等人仍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罪名被判“死缓”，直到1978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²

然而不幸远没有结束，在《幸存者的不幸》里，徐晓讲述了三个难友出狱后的命运。

先是山西的郭海，他一出狱就宣布要和“马百管”的遗孀结婚。“马百管”是郭海的同事，郭海一干人被捕后，他不怕株连，仗义执言，还到狱中送东西，因此被整，以致跳晋阳湖自杀。郭海决定和其遗孀结婚，就是要担当保护孤儿寡母的责任，“不能对不起死去的老马”。但五年后在孩子长大了许多以后，就传来了离婚的消息。“可想而知，讨债还债，报恩施舍都不足以长久地支持一个家庭，更不足以滋养一份爱情”。徐晓因此感慨说：“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当年我们为了探讨真理而坐牢的行为已无法理解的话，而郭海的行为，即使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无法理解的。他是荒唐的，又是合理的。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惋惜，既令人心痛又使人无奈”。

还有一位F也是“因此案毁掉了自己的初恋，在道德和情感的两难中被迫作出违背自己的选择”。他坐牢两年，女朋友始终以未婚妻的身份照顾他的父母，出狱后依然初心不改。女友的父亲当时是某市计委主任，哥哥和嫂嫂都是外交部驻外使馆工作人员，也都支持他们的结合，兄嫂甚至作好了政治前途受到影响的准备。但他们的开明态度反而使F感到不安：“我没有理由让她在爱人和亲人中作出选择，更没有理由让她的家人遭到本可以避免的不幸”。于是毅然决定快刀斩乱麻地和心上人分手。徐晓说：“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分明是为了别人的清白而割舍了自己最看重的爱情。F的做法是救了她还是毁了她？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任何逻辑和知识，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几乎都是无力和贫乏的”。

晓峰是军队干部子弟，也因结识徐晓受牵连，被所在东海舰队送进军队监狱。他的老

¹ 北京市公安局：《赵一凡同志的复查结论》（1978年12月19日），收《民间书信（1966——1977）》，第306页。

² 徐晓：《幸存者的不幸》，《半生为人》，第118——119页。

军人的父亲受到极度的精神压力患了癌症。两年后，晓峰以“开除党籍，保留军籍”的结论复员回家，见到生命垂危的父亲，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一个月后，就去世了。晓峰“终于为自己没有对父亲说点儿什么（按，他也实在不知道如何向父亲解释这一切）而懊悔万分”。悲剧并未到此为止：他出狱之前，为了照顾老人，本也在部队服役的弟弟主动复员回家进了工厂，却不幸因为试车事故而死于非命。“晓峰不可能不面对铁一般的事实：父亲和弟弟的死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面对家庭的惨剧，他无法稀释对亲人的浓浓歉意，无法化解对自己深深的自责”。徐晓说：“不是每一个犯下错误的人都会产生内疚和歉意；不是所有的内疚和歉意都是由错误而产生”。¹那么，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

当时，这样的冤案是遍布全国的，可以说是贯穿文革始终的。这里就有一封信，写于1972年，写给自己的男友，北京65中高中生，在内蒙插队，两年前因为抵制和不满林彪、江青等的言论，而被投入牢狱，判了七年徒刑。信件一个月只能写一封，须经看守的队长审查，因此写信人说：“这不是情书，而是一封公开信”：“听八姨说，她非常惦记你，常扳着手指头在那里算，算你什么时候能出来。两年过去了，还剩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个日日夜夜——”。“看到你的信皮总是写错，就有些担心。不知你现在身体如何？我很惦念。还记得八年前你初次给我的印象，在心里我称你为‘好斗的小公鸡’：活泼、热情、无忧无虑。鲁莽还有点不自量力——。我希望，将来见到的仍然是活泼、热情、勇敢的你，当然身上的弱点能够少一些，更成熟一些——”。“我觉得你太重感情了。感情本来是美好的东西，但深深沉溺下去就不好了。沉溺者即是懦夫，你说对吗？几年以前，我不能想象，没有爱情我将怎样生活。正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生活教育着我，通过不断学习和同自己内心的我艰苦奋斗，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此，殉情者是渺小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此事古难全’。20世纪的人更该懂得这点辩证法”。“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有的时候我非常乐观，有的时候又非常惨淡。用一个草原的比喻再恰当不过了：‘像草原上的天气一样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奇怪，一个人的成长也

¹ 徐晓：《幸存者的不幸》，《半生为人》，第121——123页，第124——125页，第125——127页。

为像历史的发展一样，是螺旋前进的。尽管有无数的曲折与反复，但毕竟是向上的，不管别人是怎样看待的。我是一个倔强的人，我不愿颓丧”。信的最后，引述了这一代人熟悉与喜欢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人世间决不会在我们这一代告终。我们可以不为个人不幸，而热泪涔涔，忧心忡忡”。¹

（十二）又一个牺牲者

《民间书信》里有一组书信的写信人与收信人是三个好朋友：杨健，北京七十二中学生，曾赴东北建设兵团，1971年参军，1976年复员；沈卫国，北京五中学生，先在山西插队，1975年入伍，1975年退伍；邢晓南，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先在兰州建设兵团，1975年转军队干校参军。三人在文革中都有参军的经历，就构成了一种典型。文革中后期的红卫兵大体有三个出路：大多数都下乡当了知青；少数人，像赵振开这样进了工厂；还有相当部分到了军队。现在关于文革青年一代的研究，包括本文的讨论，比较集中在前两者，而兵营青年一代则较少关注，这也与军队控制严，信息不通有关。这样，这三位当兵青年的文革通信，就有了特殊意义。而且最后的结局：邢晓南因在军中无法解脱精神苦闷，于1976年4月28日自尽，时年22岁，更惊心动魄地揭示了文革军队政治生态的一角。

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需要从头说起。在邢晓南离世二十年后杨健写了一篇《怀念阿南》的文章，回忆起在文革初期1968——1969年间，他们两个五号大院里的孩子，²躲在一位同学家的书房里，“在地毯上铺地而卧，闭门读书达两周之久。除了偶尔外出采购食物，我们关起房门，不分昼夜地读书。当时，读的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怎么办》和《西线无战事》等等，我们选出各自喜爱的段落大家朗读”。1969年初秋大多数

¹ 华华致B书（1972年9月6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00页，第291页。

² “大院的孩子”，是一个特殊群体。大院，主要是指北京军队与国家机关的大院，它们大都有围墙和严密的警备、保安制度而与城市其他区域相互隔离，成为权力的象征。大院的孩子都是军队与地方领导干部的子女，文革前由于家庭条件的优厚，受到良好的教育，也自有优越感。文革中他们的父母也即大院的主人受到冲击，大院的孩子也突然被抛弃到边缘位置，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到了军队。

人都下乡了，他们暂时留在城里依旧作彻夜长谈。杨健清楚地记得，在八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在纪念碑的石阶上，“畅谈未来。谈到了共产主义理想，也谈到对毛的崇拜”。¹后来杨健和刑晓南都到了建设兵团。1971年杨健参了军。1971年1月刑晓南写给杨健的信里，谈到自己在兵团里评上了五好战士，并这样相互鼓励：“我们应当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过硬的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树立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整个生命的理想。这样活着，实际上确实是最幸福、最痛快、最高尚的”。²信中还谈到了要向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军区护士刘小林看齐，在此之前1970年11月16日的日记里，还对照刘小林进行了再三反省：“我们这个厕所，我早就看到它脏了，打扫不打扫呢？扫，我怕的是什么呢？臭、脏、麻烦。有时还怕人议论。有这些思想说明了什么？”

如杨健所说，这样的狠挖“灵魂深处”的自我拷问，“对我们有强烈的魅力。自我鞭笞得愈苦，拷问对人的魅力就愈大”，“斗私批修使我们如此着魔，我们为此迷闷、自虐和满足”。³原初纯洁的理想主义就这样被利用，引入歧途。

这样的理想主义一旦遭遇现实，必然碰壁，而引发更深刻的痛苦。1973年8月31日沈卫国写给杨健的信，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在部队不动脑子最吃得开，没主见的能逆来顺受的就是好兵”。其实在1972年就有一位也是在当兵的朋友写信给杨健，说在部队里，最吃香的就是写两类文章：“一类是批判文章，大骂别人使之狗血喷头，虽然打击了别人，又抬高了自己，还无危险，只要立场正确就好办。一类是颂词，拍拍马屁，也不容易犯错。而要写些‘建设性的意见’则容易栽跟斗”。⁴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气氛，是绝不允许有独立思考的士兵存在的。

沈卫国1973年这封信就谈到“爱思考问题”给他们带来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的：“咱们这号人多少有些骨气，不愿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大部分亏就吃在这上了”。在这封信里，沈卫国还大谈国事：“堂堂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仅七八个样板戏吹得神乎其神，达到了可笑

¹ 杨健：《怀念阿南》（1996年），收《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0页。

² 刑晓南致杨健书（1971年1月19日），摘自杨健：《怀念阿南》，收《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0—311页。

³ 杨健：《怀念阿南》，《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1页。

⁴ 小欢致杨健书（1972年4月2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164页。

的地步”，“现在不用说‘揭露’，就是颂德的文艺也难免变成毒草，只有‘制式’文艺才是最好的”。还顺便谈到民间关于文革宣传的顺口溜：“朝鲜说说笑笑（指电影）越南飞机大炮，阿尔巴里亚站岗放哨（地下工作），罗马尼亚搂搂抱抱（指《多瑙河之波》），中国的新闻简报”。¹如此放肆地妄议国家文艺宣传政策，显然是危险的，在军队里尤其不允许。

在1973年的另一封信里，就谈到了“处理人事关系”问题引发的困惑。在杨健看来，这是他们这些大院里的孩子“走向社会遇到的共同障碍”。沈卫国在信里，一面谈到面对“世人见我恒殊调，见我大言皆冷笑”的孤立必须坚持自己选择的路：“我们不愿为个人升官、发财、名利、地位而忙碌，认为这样浪费时间，玷污了思想，有什么不正确呢？”但同时又提醒说，不能“完全随心所欲”，“有些事还是‘违心地’办”，“否则还是难免复员、转业，更谈不上掌权了”（按，大院的有“大志”的孩子还是不忘“掌权”的），“因此，怎样做好原则性、灵活性问题？需认真解决”。²而每回灵活的、违心的做有些事，又会引发更深的自责。

如杨健在以后的反思里所说，“文革期间军中极左的环境和恶劣的人际关系，文化封闭，管制生活，农民意识和长官意志都不同程度地残害了我们青少年时代形成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没有这种经历的人难以想象这种生活的苦难，它就如同关押在令人窒息的无窗囚室中”。于是，在收入《民间书信》里的邢晓南在1975年5月8日写给杨健的信里，就有了更多的孤独，无奈，以至恐惧：“我掉在一个深不见底的裂缝里”，“我以为百分之百的光明正大就好，结果适得其反。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推心置腹，都可以作毫无保留的自我批评，但同样，适得其反”。因此而自责：“太求全面了，太心胸不开阔了，太不实际（总要以纯粹的哲理做行动的依据）了”。同时产生的是“可能终究成为庸庸碌碌的人”的隐忧，“我不甘心当社会的食客，但也很难摆脱这种状况，真是不可解脱的矛盾”。信的最后一句话是：“真孤独。想和你在一起”。³邢晓南就这样完全陷入了无休止的矛盾与困惑中。杨健

¹ 卫国致杨健书（1973年8月3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42页，第243页。

² 沈卫国致杨健书（1973年6月），摘自杨健：《怀念阿南》，《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2页。

³ 邢晓南致杨健书（1975年5月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08页，第309页。

说：“这种长期的斗争使阿南心力衰竭。我不能不说出令人痛心的事实：军中生活使他的思想萎缩了，思维天地也狭窄了”。¹进入死胡同又走不出，就离最后的结局不远了。

1975年11月2日，又有这样一封信：“我发现我尽管小心谨慎，然而却不会耍滑，尤其是不会表演，不会逢迎和暗箭伤人，所以终究要吃亏”。并且表示：“我想尽快复员”，“我这五年一直不敢放心说话，恐怕捅了马蜂窝，只有见到你，能放心出口气。这些年梦见你也记不住多少次了，只想能见你一面”，“和你们谈话会给我力量，因为我目前只能独立支持。——”。²

杨健收到的邢晓南最后一封信写于1976年3月1日，似乎有了一个积极的选择和态度：“我们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只要身体能达到一般水平。就开始干起来，一定要把我所在的单位（一个组？一个排）搞好，为其他单位打一个头阵。至于会不会有人欣赏、发现，我是不在意的。战争年代，就是要有人舍生忘死带头冲锋，现在也一样。冲找前面的人或许中弹死了，或许终于冲上去了，但不论怎样，终为后面的人打开了一条路，吹响了一声号角——”。³信寄出后不久，邢晓南即被通知退伍。此信距阿南辞世的4月28日，仅隔四十七天。

一个朋友私下对杨健说：“阿南的事，我完全理解。我在军队中就几次想到过死啊！”也有人告诉杨健，大院中一女孩子在昆明军队里受到精神压迫和日常困扰，深受刺激复员回京两年后还不许别人提到昆明两字：许多人心灵深处永远抹不去的文革军旅生涯的痛苦记忆，也是这一代人文革精神史上不可回避的一页。

但邢晓南的死，并没有如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因此而结束一切苦难：他所在的军政干校按文革的阶级斗争逻辑，在上报军区、下发各支部的《组织结论》里，给邢晓南加上“背叛革命”的罪名：这样以革命名义的鞭尸，同样显示了文革专政的反人性的残酷性。该《结论》还说，死者读阮籍、杰克·伦敦等人的书，受封、资、修的毒害，并受杨健个

¹ 杨健：《怀念阿南》，《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3页。

² 邢晓南致杨健书（1975年11月2日），摘自杨健：《怀念阿南》，收《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3页。

³ 邢晓南致杨健书（1976年3月11日），摘自杨健：《怀念阿南》，收《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4页。

人奋斗、成名成家思想影响，等等。这又形成了对活人的精神折磨：杨健因此永远也摆脱不了内疚与自责，尽管明知该负责的不是自己。这是另一种形态的残酷。杨健在二十年后，写下了《怀念阿南》，说“他常不期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梦醒而泣，常常要泪湿枕畔”。徐晓读了杨健的《怀念阿南》，也“潸然泪下”。²

（十三）面临选择

前文谈到从1968年知青大规模地下乡开始，就有“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争论，以后就平息下来；但到1973年以后，“要不要扎根”的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这在《民间书信》里也有反映。一封写于1973年8月的书信，就有这样的讨论——

在西安曾经和你谈了一次，对于决心扎根的想法，我很佩服。坦白地说，我下不了这个决心，除非形势所迫，比如说毕业后又分配到农村。我的事业心很强，又丢不下建立一个家庭的美好前景。所以几年来我一直是：留在农村干可以，一辈子不行。下这个决心不容易，各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到，物质条件、家庭问题、生活、队里的关系，最后还有个人的婚姻问题。即便下了决心，随后还有许多问题：吃苦受得了吗？不仅精神上还有身体上受得了吗？要干到什么程度？如果干不出什么名堂，只是当了个普通的劳动力，怎么办？干了十年以后，余家沟的面貌没什么改变，半路退回去吗？我感到你的决心很大，然而对具体问题缺乏考虑。我们不是什么先知，但眼光总要放远一些。你可能会说，凭着坚定的决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坚定的决心从哪里来呢？只有对客观环境作了切实的分析后，决心才可能坚定。一般的说来，物质的力量较精神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无论如何决心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³

¹ 杨健：《怀念阿南》，《民间书信（1966——1977）》，第314页，第315页，第316页，第309页。

² 徐晓：《幸存者的不幸》，《半生为人》，第128页。

³ 小年致克明书（1973年8月10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38——239页。

“扎根”问题到1973年开始，延续到1976年文革结束，再一次成为知青讨论的中心话题，自然是因为形势的变化。研究者告诉我们，起因是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县下林村小学教员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恶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有关部门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二是“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这么一来，只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¹

这封上书引起了正准备对文革进行某种调整的毛泽东的注意，于1973年4月25日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²在毛泽东指示下，1973年6月召开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决定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主要是放宽回城的政策。有的地方不再鼓励知青扎根农村，有的采取轮换的方法，使经过几年锻炼的知青能够回城，以推动新知青下乡。在招工、招生和征兵上也强调城乡一视同仁，甚至向知青倾斜，再加上1974年由于长期经济亏损，撤销了全国多处生产建设兵团，许多兵团战士乘机以病退、困退为由回城，这样，在知青中就形成了一股返城风。同时再一次引发争论：“扎根派”认为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再教育派”则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接受再教育”，没有要求下乡青年一定要在农村扎根。³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再来读《民间书信》里收入的这一时期的许多通信，就很有意思：许多知青面临着选择的困惑，大体上还是两种倾向。一种是选择离开农村，但作出这样选

¹ 李庆霖上毛泽东书（1972年12月20日），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第173页，第17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²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1973年4月25日），收《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第177页。

³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54页，第255页，第256页。

择并不轻松。其中一位这样向朋友倾诉——

你就看过《毁灭》（按：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写的小说。鲁迅翻译）吗？我在今年夏天看了，有些人讲，书中的美谛克多像现在的许多知青呀！怀着美丽的幻想参加游击队，最后又用极堂皇的借口当了逃兵。我反问自己：我像美谛克吗？不！我虽然也有美丽的幻想，但我在现实的斗争中，还是充满热情地去追求新生事物的，还是想用行动来改变这里的。而我想离开这里，的确不是由于物质生活低下，而是不愿意以自己的一生作为一种毫无价值的牺牲而留在这里，我情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我现在看到，这里除了要我当一廉价劳动力外，别的都是不需要的。因此，我不愿意在这里，我认为在这里是屈才，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屈才。¹

在给另一位朋友写的信里，又有这样的自我辩解——

我想离开那里，是因为干部不行，有得力的干部，我是决不肯放弃那里的。对于去内蒙，过去不后悔，现在不后悔，将来即使离不开，那我也不后悔。而我离开那里，对我，只说明了一点，就是，这是曾经决心扎根的地方。但是，干部们不给我们创造留下来的条件，破坏了我们留下来的基础，逼得我们离开了那里。我能够正面回答那些卑鄙的人（我指的是现在社会上自作正经，装模作样的人）的所有指责：我去内蒙，是逼的，但我是对的；我离开内蒙，也不是错的。

在信的结尾引述了鲁迅的一句话：“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又点了一句：“知青心中，就是在深深体会这种悲剧的狂暴冲击的”。²

¹ 小方致老蔺书（1973年11月），《民间书信（1966——1977）》，第252页。

² 小方致温德平书（1974年4月10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73页。

另一种选择是扎根农村，但也充满矛盾。一位看来是干部子弟的知青，他说他曾向一位长征老干部“谈了我的决心。我说在中国不了解农民就不能会懂得革命。他又给我加上一句，不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理解农民，就不可能去革命”。那么，他已经意识到，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庄稼汉联系在一起”，是作革命接班人的关键。但他接着又坦然承认，这对他还是“一个痛苦的题目”，“现在来说，还很难下这个决心”。但最后还是表示：“我必须去做”。¹在另一封信里，大概是下了决心，态度就鲜明坚定了许多：“在最基层，不脱离群众，在创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劳动事业中，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这是我立脚的基点，是我永远的方向”，并且这样表示自己的思想立场：“我们的思想要正统，但是不要僵化。所谓正统，就是和大多数群众的方向一致。而不僵化，就是要深刻地懂得群众现在的经济状况、政治状态，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历史联系。所以，要学会生活，这才真和大家建立起利害一致的血肉联系、政治联系，才可能真正在这块土地上有厚实的根基”。²

另一位扎根派在给朋友的信里，一面表示决心：“做一个拿起套马杆能放牧，拿起笔来能写文章，又懂得牧业改革技术的这样的新牧民，为改变牧区面貌作出努力，这就是我的志愿”。同时又指出：“没有正确路线指引，不给予一定的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保障，上山下乡就要受挫折”，“大量知青倒流”是有客观原因的。他承认，现有的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太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些人不是想躲避牧区生活，而是被迫离去”，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又强调，“离去是消极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城乡的差别要消灭，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这差别同样要消灭。边疆的落后面貌怎么能不需要有知识有觉悟的青年呢？”³

1974年3月一封来自山东的信揭示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社会动向：“街头巷尾的大字报满了，————批林批孔的不多，大都是骂干部走后门的，其辞其雅例如‘官大的送上门，官小的找上门，群众干着急’之类有些真可谓传神之笔，《官场现形记》之新版横排本”。

¹ 小建致一凡书（1974年5月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68页。

² 小建致一凡书（1974年），《民间书信（1966——1977）》，第270页，第271页。

³ 杨虹致王志民书（1975年1月14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01页，第300页。

但同时又表示担忧：“现在来头不对，整到整个干部阶层，并且，手段恶劣，打击面过大，把批林整风运动方向搞偏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的潮流”，“我是坚决反对走后门的，但对于整人整干部子弟我不能容忍”。¹这里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

首先是尽管李庆霖的上书里已经提出了干部走后门的问题，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相反却在知青大批回城的潮流里，越演越烈。特别是此后的大规模的招工、招生与招兵，更是完全回到运动初期的“唯成分论”的“阶级路线”上来，首先要查档案，挑出身。而在这时，正是1973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文革中被冲击而瘫痪的各级党组织迅速恢复，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官复原职，他们重新掌握了权力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利用权力或恢复的关系，打着贯彻阶级路线的旗号，将子女送进工厂、军队和学校，以对文革中自己对子女的牵连作出某种补偿。从人情的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但却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首先是知青的再次分裂。

如前文所说，知青最初下乡时，还带着原来不同派别的矛盾而不断发生冲突，但后来却因共同的遭遇，逐渐淡化彼此的差异，形成了一个知青命运共同体。但现在，围绕着不同的出路，重又发生分化。干部子弟通过开后门占先回城，其中的高干子弟更有了直线上升的机会。接着，工农平民子弟凭借着家庭出身好，也纷纷回城。剩下的是知识分子的子女，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这样的重又恢复了的不平等造成了巨大的痛苦。1974年9月一封爸爸写给明儿的信里，谈到“同时期到延安去插队的北京同学，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其内心的无力、无助与内疚，是不难想象与理解的。但在已经十分委屈的孩子面前，只能强忍住这一切，反而要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勉为其难地鼓励说：“要更好地在农村干下去”，“你要争取入党，这是我们最盼望的，但必须是在经过很好的锻炼，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基础上争取，才有可能批准，否则，是不利的”。²这样的深陷痛苦却隐而不言的家书，实在令人心酸。

¹ 小欢致杨健书（1974年3月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64页，第265页。

² 爸爸致明儿书（1974年9月24—25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286页。

这样的新的分化与不平等，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街头巷尾的大字报的出现，是可以想见的。而前引书信里那位干部子弟感觉到的大有“来头”的潮流，也是自有根据的。这就涉及到高层的斗争。就在1974年2月，江青集团指示他们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迟群借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大批“走后门”，把矛头指向刚刚复出的老干部。这显然是利用了群众（包括知识分子）的不满，因而一时显得颇有群众基础。在不利的形势下，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报告，提出“对‘走后门’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¹这回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老干部这一边。他在写给同样向他求救的叶剑英的回信里写道：“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²有了毛泽东的保护，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开后门，搞特权，对以后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极为深远。不过，这都是后话。

和我们的讨论直接相关的，是知青问题成为党内高层斗争的一个方面，就更加复杂化了。在1973年夏张春桥已经提出“要锻炼一只反潮流的干部队伍”，江青等的目光开始注意到知青群体。1974年以后他们有意识树立一批知青模范，作为“反潮流”的典型：毛远新的辽宁推出了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刘继业等，张春桥领导的上海推出了朱克家，形成了所谓“组织化的扎根派”，实际成为知青中的贵族阶层，由知青的管理者、钦定“代表”，逐渐获得更高权力，张铁生、朱克家后来都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朱克家还被选为中共候补中央委员。这些“组织化的扎根派”都成了江青集团的御用工具，党内斗争的急先锋。

先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江青就派浩亮到河南郟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给知青送去了她的亲笔信，鼓励他们积极投入运动。1976年批邓运动中，毛远新在辽宁召开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座谈会”，把“反击右倾翻案”与“扎根与拔根”联系在一起，并以张铁生、柴春泽等19名下乡知青的名义，发表《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

¹ 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74年2月6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第16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² 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1974年2月25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第1686页。

平猛烈开火》的公开信。在此之前的1976年4月28日，在谢静宜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发表了东北兵团知青刘宁和回城知青黄一丁“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¹本来，这是两个发小之间的私人通信。先是已经回城的黄一丁在1975年11月给刘宁写信，谈到自己的矛盾：有时觉得，假如我不回来，也并不见得就是革命的；假如我回来了，也不见得不革命。有时又觉得，我这么一甩手就走了，而且撇下了肩上所有政治责任，总觉得对不起谁”。信中还谈到思想的困惑：“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去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我们口里相信的东西，手里却并不如此去做。政治这个东西，往往流于简单化，形式化，往往落后于千变万化的社会存在”。最后又自嘲地说：“我已经变了。由‘农工XXX’变成了‘浪荡子XXX’；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我想脱离政治，搞技术”。

其实，这样的对曾经信奉的政治信条的怀疑，对政治的厌倦与希望逃离政治搞技术，在文革后期的知青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但仍然迷恋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刘宁却作出了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应。他在回信中一方面坚持自己的信念与选择，呼吁“一切不愿意中国变修正主义的青年同志们，在这个扎根问题上，在对待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上，一定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要把信仰和实践结合起来”，另一面又对昔日好友宣布“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并且尖锐提出：“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²一有不同意见即视为敌人，这是典型的文革思维；刘宁因此毫不犹豫地将这位发小的信上交所在党组织，立刻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层层上报，最后作为反击“右倾翻案”和“返城风”的典型案列，公开组织批判。本来“扎根”与“返城”是知青之间由于信念、处境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选择，现在就最后纳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轨道，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至革命与反革命

¹ 以上背景材料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61页，第262页，第263页。

² 《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原载197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现收《知青书信选编》，第336页，第337页，第339页，第337页，第3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的问题。在1974——1976年党内斗争（从批林批孔到批邓）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扎根”还是“返城”，竟然成了是忠于，还是反对江青集团的站队问题。这样，就必然把那些所谓“非组织的扎根派”推到对立面。此后，在知青内部，不再有出于信念的扎根派，几乎所有的知青都选择了返城，知青历史就这样结束了。¹

（十四）“同是天涯沦落人”：那个年代的爱情

尽管1973——1976年间整个知青队伍因为去向的选择，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但天要下雨，人要吃饭，生活照样进行。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更是随影而行，并且越来越成为许多知青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在《民间书信》里，就保留了这样一份非常年代的爱情的忠实记录：1975年7月12日至1976年4月14日的六封情书。这对情侣的男方牟敦白，又名牟小白，北京101中学的学生，在文革前读初中时就与郭世英（郭沫若之子，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张郎郎（张仃之子，先后就学于101中学和外院附中）往来。因参加郭世英的X小组入狱，²出狱后又参加张郎郎的“太阳纵队”。³在文革中又是张郎郎沙龙和鲁燕生沙龙的活跃分子，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沙龙作者，写有抒情诗《拓荒者之歌》（1969——1971）、叙事诗《孤雁》（1973——1974），中篇小说《霞与雾》（1972——1974）和《在船

¹ 当然，知青进城，结束知青历史还有一个过程。在文革结束后的1976——1979年，下乡运动仍旧沿着旧轨道惯性滑行，在1979年前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知青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事件，形成席卷全国性的知青返城风潮。知青进城以后还有就业问题，大概到1982年才将待业知青基本安置完毕。参看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303页，第304页。知青进城以后，又有新的分化：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大批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都凭着知识的优势考上大学，并有机会到国外留学，逐渐成为精英阶层；而没有机会上升，继续留在工厂当工人的知青，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子弟，在九十年代企业重组中，许多人都成了下岗工人，加上还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构成了中国底层最贫困的部分。而成为精英的那一部分知青中，有的仍然努力保持与农村的联系，成为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当二十年后的本世纪初，新一代青年以志愿者的身份重新回到农村时，这些当年的老知青都是其主要推动力量，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不过，这都是本文的叙述“以后的历史”了。

² X小组是一个由四位在校大学生和社员青年组成的学习小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和张东蓀之孙张鹤慈等，还是中学生的牟敦白是其外围成员。小组成立于1963年2月12日，取名“X”，包含了怀疑、否定与探索之意。小组出版了三期油印的《X》，主要刊登自己写的诗歌、小说和政治评论。1963年5月即被公安部门抓捕，罪名是：“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和“追求绝对真理”。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401——411页。

³ “太阳纵队”，是由一批革命艺术家和干部的后代组成的文艺沙龙，主要成员有张郎郎（张仃之子）、董沙贝（董希文之子）等。他们比较早地接触到现代派文学与绘画，聚集在一起读书，写诗和小说，画画，因其反叛性而被公安部门关注，张郎郎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即被通缉，逮捕。参看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收《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地下诗歌遗照》。

上》等短篇小说。他于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回城。¹他追求的女友鲁小芹是北京女师大附中的高材生，也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士，他们是在那里相识相爱的，1975年她调到了天津大港油田，这六封情书就往返于黑龙江——天津大港——北京之间。

牟敦白在一封信里说：“我们都处在边缘”，这是最能说明他们俩在文革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的。从牟敦白在信中提到福建部队副司令员的夫人是他爸爸的老战友，副总理谷牧曾关心他的工作安排看，他应该是一个高干子弟。但其父母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后来靠万里等的协助，才“回到人民内部”。从信中看，鲁小芹也是一个干部子女，文革中至少也是靠边的。²在另一封信里，牟敦白还自称“蒙难”的“鹰”。³“蒙难”，不仅因为家庭出身的牵连，更因为自己雄鹰般的凌云壮志不得伸展。从牟敦白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自有独立思考与反叛精神，在文革中更是受到压制；鲁小芹的书信里，也表现出她的才情和独特个性，同样郁郁不得志。“同是天涯沦落人”，大概就是这样的相似的家庭背景、处境，构成了他们爱情的基础。他们的爱情曲折也从一个特定侧面反映了文革乱世中的落难者生存环境的艰难和精神痛苦与挣扎。

他们的通信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鲁小芹的父母在朋友的介绍下，准备将她嫁给一位局长的儿子，以改变处境。牟敦白因此受到极大刺激，在信的一开头就几乎是怒不可遏地说：“想不到你遇到的这种事竟如此直接，令人发指，而且是卑鄙的！我的意见是，卑鄙的婚姻只能有卑鄙的结局。如果局长的儿子是有志青年，尚可凑合，否则坚决杜绝这类事情，局长的儿子不一定当局长啊！至于我，坚定地站在这类庸俗的交易的对岸，我感到替你痛心！”“如果你能坚持己见，表明你的意志是纯洁的，否则，就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原谅我不客气！”牟敦白显然感到极大屈辱，因此，不仅大谈家庭的背景，说明自己现在的被贬斥，只是暂时的，更大讲自己“献身于事业”的“志气”，“虽然无钱无地位，但几年

¹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23页。

² 小白致小芹书（1975年7月12日），第350页，第348页。

³ 小白致小芹书（1975年7月2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54页。

来写了几十万字的记述——这可能会成为‘财富’，也或者促使我进天堂”。最后表示：“我不机智，也不世故，更不去讨人欢心，很多人讨厌我，我也不标榜自己高尚，也不能寡廉鲜耻追求你恩赐的爱情。我似乎有一见钟情之感，只要你不畏艰苦，有信心，或者我们可以终生为伴。或者分道扬镳”。¹

在此之后，他们似乎不再谈及局长儿子这一尴尬之事，或许已经回绝。但仍在信中互叙衷情。在1975年7月27日的信里，牟敦白就表明自己的“座右铭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出人头地。如果实践证明我生就是个庸人，死也活该！否则，你就应该努力，放长眼光，瞩望生活”，并且自称“在一副蒙古利亚平凡冷淡的劳动者相貌之后隐藏着一颗敏感的、平民化了的、愚钝的‘雄’心”，不幸生不逢时，“操纵权力的人们滋生对立，并且把许多对立面的子女抛到北大荒来，不幸我为其中之一”。最后的署名是：“尊敬您的、阴暗的白”。²1975年8月31日的信里，鲁小芹也大谈“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我没有才能做成一种什么事业，我只是靠一种精神的东西，永远不能实现的东西在生活”，“你说得对，我们物质上是赤贫的（也许将来能好一些），因而我们只能清高一些，自恃一些，不要轻易抹掉自己身上的光彩，成为真正‘悲惨’的没有灵魂的人”。并且说：“有时候，我看到衣冠楚楚、油头粉面的‘小开’，看到人家的小康生活，心里油然而生厌恶，我自己是不屑于就范这种人和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和你还谈得来，虽然以前素不相识，可也觉得是故友重逢，并不忌讳”。信写到这里，突然大发感慨：“现在已经是夜里了，人们都在享受天伦之乐。冥冥之中，上帝把各种命运降临给每一个人。寂静之夜还有一些人在思索，苦读，书写，好像咱们这种人就不会享受一样，命运真是不公”。信的最后说：“我还是劝你要快乐一些。我这个人天性是快乐的，虽然生活给我们投下阴影，我们还是要欢笑度日。你别老用阴郁的调子给我写信（当然是我的信也很不乐观），要达观一点”，“你说对否，咱们必须自强不息，不泄不馁，不能让王八蛋瞧不起我

¹ 小白致小芹书（1975年7月12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48页，第349页。

² 小白致小芹书（1975年7月2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56页，第354页，第355页，第357页。

们”，“最后以我最敬佩的女英雄之一秋瑾的两句诗结尾：‘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酬化碧涛’”。¹

牟敦白接到鲁小芹这封吐露真情的信，欣喜若狂，立刻回信说：“怀着十分感激和冲动的心情读完了你8月31日的来信，甚至我这个厄运缠身的人也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幸福。——命运把志同道合的人撮合在一起本十分不易，那我就应该竭尽求生的欲望，追求这个光明”，“一种崇高的、纯洁的心情在我心中牢固地盘营扎寨，这一切和你相联系”，“多少年来，我历经艰辛苦楚，只有今日，我觉得生活中也有一丝甜蜜”。欣喜之余又“想到人生对我们残酷的摆弄，就更加感到愤愤不平”，“倘使求得幸福，还需要多么大的努力和奋斗啊！”牟敦白接到信时，正在草原旅行，因此，有机会结识草原儿女，他告诉小芹：“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纯朴的、自然的性格，是我平常很少接触的”。但他又谈到在这些“姿态挺拔，朝气蓬勃”的少男少女面前，“我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惆怅，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些‘衰老’了，还在不断地流浪——”。这一刻，牟敦白显然感到自己应该有一个归宿了。信的署名是：“衷心希望成为你的莫逆之交的小白”。²不久，就收到了小芹的回信，一开头就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这个人。我老揣摸你可能根本看不起我，只是由于失意和倒运，真是鬼才知道。我有时不知怎么搞的，非常抑郁，心里乱七八糟”，“老于世故的人对我这种人可是非常不屑于搭理的。我真不想跟你装模作样地谈正经事，这会儿，实在没有兴趣”。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两天后，又重新写信，“本想把以上胡言乱语删去，可是我想还是留着吧，人贵在真实，坦率，既不骗别人，也不骗自己”。现在心情已经平静，在回应牟敦白信中谈关于草原儿女的话题时，表示“我很喜欢小孩”，而且突发柔情，这样写道：“我想，将来如果有一个属于我的孩子时，一定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长大，一定要教给他勇敢，正直，有强壮的体魄有丰富的知识，等等。总之，让他什么也不感缺乏，让我年轻时候渴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能够得到”。同时又补上一句：“你别说我厚颜无耻，

¹ 小芹致小白书（1975年8月3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59页，第360页，第361页。

² 小白致小芹书（1975年9月8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62页，第363页，第364页，第367页。

或者心里这么想，如果这样，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回到现实，又不免有许多感慨：“光阴荏苒，从六六年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回想起来，像一场噩梦一样。不过，万事不能后悔，——一切事情都有他特定的历史环境，虽然沦落天涯，可是真正认识社会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事不过九’，凡事该有个了结的时候，我不愿再流浪了”。信的结尾的话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经常写信来吧，我很寂寞”。¹

最后一封信，写于1976年4月11日，是小芹写的，开头的称呼是：“我亲爱的小白”：“送走了你，我一个人回家，觉得无限凄凉。在车站，我是强忍着眼泪，不回头，硬着心肠走的，我怕我会哭得一塌糊涂。只要你一回来，咱们马上就登记。我不再拖了，我爱你，爱你爱得发疯。——谁也能不能拆散我们——”。这大概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吧。而最后的总结是：“想想这几十年，咱们要算最不幸的一类人了，所有的倒霉事都找到咱们头上。可以，咱们还有幸运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还有爱情，有事业，有理想，——（这）是我们精神和生活的支柱”。²

（十五）最后的回眸与反思

知青生活的最后阶段里，有选择出路的困惑与骚乱，爱情的曲折与甜蜜，更有严肃的反思和痛苦的拷问。

在1976年3月的一封信里，李南，北京技校的学生，在内蒙插队的知青，对在文革中的经历、思想发展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思考。她谈到自己从红卫兵到知青经历了一个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从学校出来之前，认为反抗的是校领导，走出自己的学校，才发现这迫害不限于一个学校。而到了草原才明白这是社会的产物。反抗一个学校，一个单位的错误是容易让人坚持到底的，因为这多多少少还能使人存在一丝幻想。在看到反抗的是社会的时候，如果不能站起来，站到这个社会之上，那么破坏导致的是疯狂，是死亡”。她举了一个

¹ 小芹致小白书（1975年9月2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68页，第370页，第371页。

² 小芹致小白书（1976年4月14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93页。

例子。文革初期，在学校“辩论（鼓吹“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血统论的）‘对联’的会上，我理直气壮是因为我的对手们除了谩骂之外无法驳倒我，他们人多、势壮，但我知道自己高于他们，我在那个场合，是实际的胜利者”。但以后到了社会，才发现“在社会空间里到处弥漫着对联的气息”，“他们用不着大声斥问：‘出身？’也用不着大骂‘混蛋！’可是在他们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你可以听到这两句话的余音”，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就是按照“对联”的潜规则组织运行的，“要藐视他们就得藐视他们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是你在其中生活的”。要反抗，就是要反抗整个社会，以致生活本身。“与社会的这种暗中争斗，远没有明显可见的英雄气概，却在其中流着真正的血”，而且会伴随着“极度的思想混乱，造成精神上的失常”。因为最终会发现，“突如其来的压迫，逼着你扭转过去的方向，而又是自认为正确的方向”，经历“政治的死亡”与“理想的死亡”，“心灵的死亡”，为了不要作“陪葬”，就必须重新质疑，思考，“只有站在这现存社会上一台阶的人，他们才是希望”。¹

因此，告别知青生活，对一般人来说，无非是脱离农村，返回城市；但对李南这样的一批思考着的青年，更需要从精神上走出“政治上死亡的拘留所”，从无数曾经迷惑过自己的“官方虚伪的空话”里挣脱出来。²这是我们前文讨论过的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怀疑主义思潮的延续，但因为发生在知青运动结束期，就带有某种总结性，而且如李南所说，已经站在“现存社会上一个台阶”，就更加全面，彻底，进入了更深的层面。

1975年5月李南的一封信，对“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这一文革也是知青下乡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与动力，提出质疑，追问“中国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主义？”李南说她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对此作出了全新的思考：“我的想法是：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投胎出来的，那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时候——大工业充分发展，没有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的时候，无产阶级就没有力量战胜资产阶级。在这种时期所产生的国家，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不过它最初的形式，不同于老的资本主义国家”。

¹ 李南致XX书（1976年3月1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87页，第388页。

² 李南致XX书（1976年3月1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87页。

“为什么当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军，要以南、苏为前导，列着方阵进入修正主义的大门？”

“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建立的话，不能巩固已是历史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恩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那么远，应该怎样看待？”“目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补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中国的空白，所以，变‘修’，作为历史的发展，则是必然的，否则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里，‘修正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修正马恩的思想，而是在修正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偏差”。¹在1975年的中国这样提出并思考问题，显然大逆不道；尽管这样的思考和讨论，还需要更进一步深入下去，但思路已经打开，而且再也阻挡不住了。

1975年6月一封寄给赵一凡的书信，提出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如写信人所说，由于对“现在的某些东西不理解”和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对文革本身提出了质疑，而且这样的质疑又是出于不同的观念、处境，立场、动机，众说纷纭，差异极大，并引发各种争议。写信人想讨论的是一种观点：“文化大革命前的许多东西都比现在要好，要革命”，不满文化大革命而希望恢复文革前的状态，这样的“回到十七年”的思潮，在文革后期是颇有影响的，盛行一时的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思潮就是一个突出代表。写信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把我们的阴暗面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全都暴露在人民大众面前，它使我们一步步认识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的曲折复杂，复辟的可能性和反复辟的艰难性，打破了文化革命前的天真、浪漫，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党内的斗争，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的前途，这些我们过去可才曾懂得多少？又可曾为它操过心呢？现在主席把这些都交给了人民，交给了我们，虽然大家多了许多疑问、不解，可这比以前朴素、简单的意识要宝贵得多，总是平衡的稳定的危险的”。²这样的争论其实是一直延续至今的；重要的是，争论一经开始，“文革不可质疑与讨论”的神话和禁令就被打破了。

¹ 李南致彬彬书（1975年5月），《民间书信（1966——1977）》，第321页，第319页，第320页。

² 小建致一凡书（1975年6月1日），《民间书信（1988——1977）》，第335页，第337页，

我们在前文已有讨论的北京沙龙的重要成员北师大附中学生潘和戎，在1975年12月31日有一次通信，这是她们收入《民间书信》四封信的最后一封。讨论的是：如何看待我们经历的一切，经过文革塑造的今天的自己，是“基本肯定呢，还是背弃？”这就把对外部（国家基本体制，文化大革命等等）的质疑与总结，指向自身。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我自己的有些最原始的思想，虽然几经生活尘埃的扑扫、堆积，然而始终在顽强的闪烁着。而现在，这种目标的明确，用情的专一，是我自己虽再三用怀疑论来验证，都绝无否定之余地了”。这可以说是“初心不变”，怀疑、否定中的肯定吧。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经过文革洗礼的自我（或许可以说是一代人）描述：“我成为一个比较过去成熟，更自信，更明晰、更顽强的人，生活目标是非常明确了。我想，人除了那些爱情的、诗意的、伤感的个人之外，仍然需要一个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信念的人，人应当是这两者的总体，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使自己得不到全面的满足”，并且有了这样的“给自己未来臆造的肖像”：“既不陷于狂妄的理想主义，也用不着小市民的泥巴抹到自己的脸上。一个平凡的人，然而正直的、有用的人。人不用妄想自己是圣人，但也用不着丑化自己，硬认为自己是卑鄙、自私和委琐的，人不是动物，他有上进的决心，而这种努力，会使自己保存高尚的思想”。这里，“爱情的、诗意的、感伤的个人”与“平凡的人”的强调，自然是对文革对个人的抹杀，以及充满圣人崇拜的英雄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的一个历史的纠正，但并没有走向“小市民”的卑微与自私，仍然坚持“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信念的人”的理想，以及人的尊严与高尚。所要实现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结合，平凡与高尚的统一：这是扬弃了文革理想主义后建立起来的新理想主义，这正是前文说到的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新人”。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目标明确，用情专一”；更有不少人陷入了痛苦的“我是谁”的追问。一封1976年2月的通信，写信人反复说一句话：“我决不是一块‘革命砖’被党‘东西南北搬’来（搬去）”，这是经历文革得出的最主要的自我认识，但一旦公开说出来，

¹ 戎致潘书（1975年12月3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75页，第376页。

就引来了许多麻烦，但仍不后悔，坚持“绝不说假话”，这也是最重要的文革教训。¹

知道了自己“不是什么”，但“是什么”，“要追求什么”呢？这是更大、更根本的困惑。1976年3月的一封信，就如此提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现在我的回答就是：

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活着！活着！——”，“生活到底比幻想难啊！”。接着谈到“我现在真正地理解了孤独，当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一切安慰都离开他，一切苦恼都追逐他，这就是最沉重的十字架”，“孤独——我并不怕它也不爱它。无论怎样我只希望用‘心’说话。可是我所见到的人，都不习惯用‘心’说话。所以我不愿意去找别人，也不愿意别人来找我。对于孤独，我不能说我在忍受，而只能说‘孤独，默默的孤独’。就这样——手指插进头发去，过分的睁大两只眼睛”。²几天后再修一书，说自己“全部精神被生活窒息了”，“生活，没意思极了。其实根本没有生活，革命！革命！革命——”。³这位写信人自称曾是“幻想的儿子”，一旦从“革命”的“幻想”里醒来，就陷入幻灭的悲哀了。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这样写道：“苦闷，苦闷，无穷无尽的苦闷——这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或其他什么阶级的感情，而是一个孩子般纯正的，来自天性的感觉——心灵压抑着剧烈的浪，泪水在眼圈里一闪一闪——如果你愿意听，如果你愿意信任——一个孩子在火山口上发出嘶哑的哭声，小手向天。‘妈妈在哪儿？亲人在哪儿？我的生命在哪儿？——’。我碎了，完完全全地碎了，随着那个孩子的哭声碎了——遥远的雷声震荡着：人类要向上！要文明（知识）、要自由！——这才是人类要求的美！”⁴苦闷与希望的交织：这是可以看作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寓言的。

这又是一个自称“心甘情愿做一个到老还保持赤子之心的人”，“仍旧在冒着文革前傻气的孩子”的倾诉：“最折磨人的不是艰险、困苦、失望，而是孤独。它用一种极不让人可耐的方法折磨你，使你简直要发疯。我真想歇一歇，命运向我要求的太多了。可我毕竟还

¹ 吴力工致长征书（1976年2月9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78页，第379页。

² 力致向明书（1976年3月6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84页。

³ 亚力致向明书（1976年3月1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86页。

⁴ 力致向明书（1976年3月6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83页。

⁵ 力致向书（1976年6月5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98页。

是要向前走，我还梦想做一个生活的强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¹

另一位写信人似乎要积极得多，他同样提出“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却以“鲁迅在他题为《彷徨》的小册子序言中引用的屈原的诗句”作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²这也是一种新的自我定位：曾经的理想、幻想破灭了，又没有找到新的目标和道路，但仍不愿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既然认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就重新开始“上下求索”，做一个新的探路人吧。这或许在新的历史转折即将到来的时候，更多的曾经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种选择。

李南在1976年3月、10月的两封信里，描述了在经历了“走向地狱”般的体验以后，所达到的生命境界——

“走向地狱，用最冷酷的眼睛来观察这个社会，抛弃了那种行尸走肉还不能舍弃的装饰，我得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结论：凡是死亡的事物，都带上了死亡的色彩，而这色彩，用什么颜色也掩盖不住的。”

“必将走向死亡的社会，带着它所有的成员向地狱迈进，只要自认属于这个社会，那么，不管他给自己戴上什么样的桂冠，他也不过是这个社会的陪葬，从甘心陪葬的人中间，是看不到新社会的出现的。”

“我清楚地看到前面的死路，我没有骗自己，没有故意地把脸扭开，甚至没有一点掩饰。我认为既然是死，那么不如干脆就站在那地狱的最底层，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愿意死，但我也怕死。在我看不到活路而选择最惨淡的路的时候，责备我‘糊涂’是可以的，可是责备我软弱却是不合适的。觉得生活无意义的很多，但是敢选死路而不是真死的人却是不多的。很多人虽然这样走着，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死，反而认为这是生的！”

¹ 其照致也夫书（1976年6月16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401页，第499页，第402页，第403页，

² 峰致光明书（1976年3月3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80页，第381页。

“有人责备我，说我不应该失望，而要从现在的社会中找寻可以生存的缝隙，去扩大自己生活的圈子，去图变革，去争取。然而在现社会，没有我生存的条件。”

这是“一次自我否定”，“在绝望的挣扎中，向着自己认为是生路的地方扑过去，驳倒一切人的否定。而最后，却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下头来。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生路的，到处都是沉溺。”

“我的固执，是在于我无法改变我的看法，我认为生活，一切就不应该是这样子，而应该是别样的”。

“只有站在这现存社会上一层台阶的人，他们才是希望。他们生活在现存的社会中，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高于这个社会。死亡永远杀不死生命的芽。未来的社会，是在这样的人中间产生，发展的。这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被现在和人们扼杀着的”。¹

用“最冷酷的眼睛”，抛掉一切“装饰”，得到“真实”，看到的只是“死亡”。又在“绝望的挣扎”和“自我否定”中，站在现存社会之上，去寻求“别样的生活”：这样的“反抗绝望”的人生选择和生命境界，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鲁迅的《野草》的。

而在1976年10月1日的信里，李南直接谈到了鲁迅的《孤独者》。她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和《孤独者》主人公魏连受同样的问题：活着的理由是什么？“为那些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活着么”？或者“为那些不愿意我活着的人活下去”？后者是魏连受（一定程度上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现在这位中国七十年代的知青说：“我曾经想为那些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活下去”，“我曾几乎走上了连受那种结局的路，却被人拉住了”，“现在，我为那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挣扎着，找寻着活下去的路。因为他们愿意我活下去，我不能让他们痛心。在这种活着比死更痛苦的时候，我个人的抗争总还能显示出我是活人”。

最后提出的问题是：“盲目的坚强的反面便必然是疯狂的毁灭，像我过去那样生活，已经是明明白白过不下去了”，那么，“应该怎样在这种时代过认真的生活？”“怎样才能像个

¹ 李南致XX书（1976年3月1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88页，第389页，第390页，第389页。

样子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大概是知青与文革历史即将结束的时候，当年狂热投入运动的年青一代，都在思考、追问的问题。在前一封信里，李南还谈到，“‘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已经与我无关了，但是我难道不能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上去争取突破吗？”²这都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关于知青心路历程的讨论也可以到此结束了。

《民间书信》里收入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77年2月10日，收信人是李南，写信人是周郿英，北京65中的学生，此刻还在内蒙草原当知青。信中写道：“今天一个朋友结婚，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晚上回家，又得知另一个朋友在下午被判处死刑。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又能怎样？这就是生活罢”。

这里说的朋友被处死刑，背后是一段至今仍被遮蔽的历史：尽管“四人帮”已经被捕，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新的执政者依然延续文革个人崇拜与阶级斗争的逻辑，在1976、1977年间，对继续批评现实政治和最高领导的民间独立思想者进行了一次大镇压，其中有知青李九莲、钟海源，大学生王申酉，工人史云峰等，周郿英的朋友应是这场新的血腥镇压的牺牲者。这表明，文革结束，又开始了新的思考、质疑与反抗，在现行体制下又必然遭遇新的压制，以至镇压。写信人周郿英与收信人李南后来都成为八十年代《今天》为标志的新的思想、文化、文学运动的骨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是他们的文革知青时代思考与行动的继续。不过，那是另一段历史了。■

2015年11月19日——12月15日

¹ 李南致老周书（1976年10月1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421页，第422页。

² 李南致XX书（1976年3月17日），《民间书信（1966——1977）》，第391页。

【重要启事】

本刊从2017年元月起，实行会员制。凡如本刊声明所说，提供本人出生年、教育程度、所在地和职业，并承诺完成下述诸项条件之一者，即有资格成为本刊会员，无偿获得本刊：

一、一年之中至少采访一名文革亲历者，将访谈形成的文字交《记忆》发表。

二、或一年之中至少有一篇来稿为《记忆》采用。

三、或一年之中至少为《记忆》提供一份文革史料（包括日记、笔记、传单、小报等）。

四、或一年之中至少给《记忆》写两次读者来信：或提意见，或提建议，或评文论事，或谈个人感想。字数不限。

五、或以其他方式帮助本刊。■

《记忆》方惜辰 谨启

2016-11-30

【来信选登】**1. 崔金珂：对《记忆》杂志会员制转型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一名文化革命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记忆》杂志对于我的帮助非常大。方先生为了文革研究可以发扬光大，在如此晦暗的大环境中的努力实在是很令人敬佩，如果文革研究的大众化可以切实实现，实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也因为如此，有些不成熟的意见，我也不愿以一孔之见来干扰《记忆》发展的决心和方向。但是内心实在是有些担心和疑虑，一些简单的看法还请您考虑：这项改革战术中不可行，战略上欠妥当。

（1）战术层面不可行，是指文革口述大众化的尝试，缺乏成功的可能性。以我作为一名博士生有限的文革口述研究经历来看，特别是这些年来在山东和山西采访亲历者，大众化的尝试实在是困难很大的一件事情。口述的对象无非是两者，一则关键人物（各类头头等等），二则普通亲历者（家里老人等），都有各自困难。以现在国内青年人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程度，去采访文化革命的关键人物完全不得要领，缺乏对话的可能性。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虽然是北大党史硕士的专业出身，但是至少经过了3年的系统研究之后，才敢

说稍微摸到一点做口述采访的经验。根据我们对记忆理论的理解，试图通过口述来了解历史事实是基本不可能的。记忆本身是会发生变化和适应的，与其说是对于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向解读。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很难想象这个东西会走向大众化的成功。更何况现在做文革口述史的条件之恶劣，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我们这些年来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联系采访人，十之八九都是不成功的。前些年是毕福剑的事情害死我们，近些年是愈发严厉的自我审查拒我于千里之外。如果试图发动大家都去家里采访家中老人，起码在现在的中国还看不到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可能性。我当然希望中国能像1960年代德国的青年人一样，开启一个质问父辈的新时代，从而推动全社会对纳粹的反思进程。但现实中看不到这样的动员能力，无论是主观层面还是客观层面。缺乏对于历史论述的宽容空间，让口述大众化的尝试困难重重。

(2) 战略层面欠妥当，指的是在现在的环境下，试图推动这样一件需要广泛动员的行动似乎并不理智。2016年《炎黄春秋》被夺权、《共识网》歇业，中文文革研究的平台媒介越来越少。我真是衷心期盼《记忆》首先能够长久远。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在我看来，《记忆》杂志之所以能够幸存至今，就是因为坚持了“学界”、“同人”、“专业”、“有限（甚至是自限）”的战略方针。现在就暴露或最大化或变现《记忆》所能承载的社会动员能力实在是很让人忧心。如果因此而猝死，必将是对于文革研究的重大打击。《记忆》一向所倡导的“三个面向”的路线：“民间”是理论导向、“业余”是覆盖面导向、“青年”是未来导向——都是为长远计，都是不急于眼前之力。不恰当的引用，现在似乎以“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的路线最为适用。《记忆》杂志积聚的是无比珍贵的正能量，《记忆》的每一分相忍都是为国、为青年、为未来。

但目前的改制方法，其实有些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希望推动广大群众的参与，另一方面则必须参与才能变成会员。而广大群众之所以能够对文革感兴趣、并最终发展为参与，可能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而且我们不也欢迎广大群众即使不能参与，也能围观么？这样的群众不也是我们潜在的影响力来源么？这样的群众可能才真的是最多

数的读者类型。在网络时代，围观也是伟大的参与。这样的内闭性会员制无疑是斩断了这样的可能性。

对于《记忆》的转型，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1、分灶吃饭：《记忆》学术化，大众化尝试另起炉灶。作为中文文化革命研究的专业刊物，《记忆》应该承载更多的学术研究智能，完全可以成为学界水平最高的学术期刊。建议成立专业编委会，引入更加严格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制度，严格引用审查，将《记忆》论文的质量提升到国际专业学术期刊水平。

大众化的口述历史推广完全是应该做的，而且意义重大。但我反对将提供口述记录和发表文章作为会员的标准。同时，这种广泛群众参与和专业学术写作完全是两个方向上的事情，没有必要放在一起。建议将这一部分职能单独分列，可以创建副刊和资料专辑，也可以以另外的名称出版新的期刊。

2、收费会员制，决解经费问题。我愿意通过正常合理的经费渠道为《记忆》做贡献，广大海外汉学系和中国研究机构也会愿意以这种国际通行的方式来获取最新最前沿的中文文革研究进展。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如果《记忆》在专业化和大众化这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展感到力不能及，不如专守学术平台。这似乎是以最少资源换取最优绩效的可能途径。以学术声誉带动社会影响，我想总会有双丰收的那一天的。■（您说得全面且中肯，但有些情况您不了解，这里也不能细讲。容我想想，下期答复好吗？——方）

2. 程真：市场化是大方向

同意上期红标的意见。《记忆》有不小的读者群，并有高水准的作者群体。如何坚守这个阵地是当前的要务。合格有水准的文字是生存的根本，但好的文字靠编者去向有能力的作者访求，不是入会者的“承诺”所能满足的。而且大量因“承诺”而发来的文字会成为编辑人员的负担。《记忆》有大量粉丝并不发声，但期期阅读。不发声有许多原因，在国外

的可能不理解。因此要考虑不发声的阅读群体的要求，收取一定费用获取会员资格更现实。但收费会产生许多问题，如纳税，是否给作者付稿费等。

走市场化道路是个方向，较大的读者群说明刊物的影响力大，影响力是刊物的价值所在。问题是如何把《记忆》的影响力变成市场价值，以此获得刊物长期生存的资金。■

3. 印红标：读者参与可采用三种方式

对于读者的参与，是不是可以有三种方式：一，作者免费；二，非作者的读者可以收工本费；是不是可以再加上第三条：欢迎读者捐助，作为对本刊的支持。捐助是否实名听便。编者将定期公开明示所捐款项数额及使用情况，请读者监督。■

4. 大卫：收费是个好办法

《记忆》经费紧张以及人手不够，是最明显的困难。确实应该解决。我基本同意红标先生的意见，但也有一点不同之处。我以为，不要分什么会员非会员，可能更实际些。既能称为会员，自是更能体谅《记忆》的难处，自是更愿意多出些心力。尽可能支持编辑和作者，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刊物能够生存的更长久、更健壮，我想这是许多同仁的共同心愿吧。

因此，我个人赞成向每一位读者收取一定费用。此外，方先生提出的五条办法，我也同意。一直以来都很看重《记忆》。希望继续成为《记忆》的忠实读者和支持者。■

5. 陆伟国：可以把会员分成两部分

关于会员制我的想法是，可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核心成员，可以搞会员制。但要求每人每年都交一篇稿，要求太高，你们也看不过来。而且只搞会员制，面就太窄，不利于扩大杂志的社会影响。所以另外，对普通读者要尽量扩大范围，鼓励各界人士直接和你们联系，也鼓励现有读者四处转发。对于贵刊，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快扩大影响，某种意义上，比征集稿子更重要。■

6. 王复兴：降低标准并转载好文章

所提会员5项条件可以做到。《记忆》要做大做强，为文革史研究做出更大贡献，应尽量扩大读者群。要做到这点，当然要仰仗文章、史料的质量。因此不妨略微降低会员条件标准。如：一年有一篇读者来信即可。再如：不一定必须首发。在《南方周末》或《纽约时报》上发了，作者再投《记忆》，是好文，《记忆》也可以发。还有，每隔一、二期可转载其他网站、杂志、学术会议的文章。会员条件可加一条，每年推荐一篇转载文章并被《记忆》采用。当下信息量很大，仅微信群里大家分享的好文就很多。一个人所能捕捉到的高质信息有限。《记忆》可作为转载高质史学文章的平台。■（把推荐好文章作为入会的条件是个好建议。但是，要给“好”下个定义，很费脑筋。请您帮忙——方）

7. 陈闯创：会员应有更多的权益

我支持《记忆》改成会员制，也希望这个做法能成功，所提5项条件不成问题。不过张从说的对，会员权利或收益也要讲一下，如果只是免费获得刊物，似乎是弱了点。会员提交个人信息后，至少有利于组织相同区域内会员定期或不定期聚会。■（您的建议很好——聚会有益于切磋学问，交流信息。但不适合大洋彼岸。抱歉！——方）

8. 肃慎猫：赞同并支持会员制

我完全赞同您的“会员制”改革。我是知青子女，目前在法国读博。启事中说的“五条”事实上我都可以做到，同时，我也愿意以付费的方式获得《记忆》，我愿意用我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持《记忆》继续走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新一代的学人，能够继续扛起这面旗帜。■（在这雾霾深重的严冬里，您给了我温暖和信心。不再后悔接了这个“烫手的山芋”。希望当我把这个“山芋”传给新一代的时候，它不再“烫手”——方）

9. 杨隽：访谈史料能发表吗？

虽然我不是很赞成也质疑这种做法，但是我会尽力配合，毕竟文革研究就是这么点期刊~另外，这些访谈史料啥的都是发到您的这个邮箱吗？发了以后，如果我希望公开，你们会公开吗？■（我理解您所说的“公开”，就是发表。如果符合要求，当然能。——方）

10. 陈闯创纠错

《记忆》第175、176、177期的文字误植列举部分如下。

《记忆》第175期：

第63页第3段第1行的“侥幸心里”应为“侥幸心理”；

第69页第1段第6行的“我们心房”似应为“我的心房”；

第70页第1段第8行的“路易·破拿巴”应为“路易·波拿巴”；

第71页第3段第4行的“逍遥法外”应为“逍遥法外”；

第71页倒数第2行的“燕国”应为“燕园”；

第72页第1行的“我又向自己”应为“我又问自己”；

第102页第2段第2行的“逍遥派”似应为“逍遥派”；

第103页第2行的“贵州”应为“贵州”；

第103页最后一段第3行的“索世索”似应为“索世晖”；

另外，第97页“任大本和他的弟弟”中的弟弟名叫任大熊，至于文中说“文革开始后，因与他人谈论过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劣迹而被告密，随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拘留收监”，“在谢富治的公安六条从严、从快、从重整治的要求下，其弟最初由北京监狱收监改为转移到太原监狱收监，并于69年九、十月间被判执行死刑，立即执行”，与事实大有出入。实情是1960年任大熊就因所谓反革命罪被北京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66年8月文革开始时，当局为所谓保卫北京安全计，把正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的任大熊与大量囚徒一起转移到山西大同市大青窑劳改煤矿。1970年“一打三反”时任大熊和另外25名囚徒一起被打为所

谓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成员，任作为主犯之一和另外12人被大同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参见《1951届校友任大熊事件说明》<http://p.syyw.net/show.aspx?id=2869>；杜钧福《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

《记忆》第176期：

第73页第2段第3行和第76页第3段倒数第3行的“燕国”应为“燕园”；

第79页第1段第4行说谢富治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不对，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只是经常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而已；

第98页倒数第2行的“异意”似应为““异议”；

第103页倒数第1行和第6行提到的兰考“枹桐树”似应为“泡桐树”；

第120页第3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应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第124页倒数第4行的“杨子浪”应为“扬子浪”。

另外，第120页第2段末尾“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制订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句话有问题。第一，1981年应为1978年；第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没有制定中共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只是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而言；第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迟到1987年才有中共十三大做出事后总结。

第120页第3段开头说：在4000人大会对解放思想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理论务虚会”后期，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句话中的时间顺序有问题，邓是1979年3月提出的坚持思想基本原则，而4000人大会是1980年10月召开的。

《记忆》第177期：

第5页倒数第三行“但任”似应为“担任”，第73页第2段第3行“另到”似应为“令到”。■（出了这么多错，真不好意思。谢谢陈先生的指正纠错。由此可知《记忆》缺人手。您是否愿意做我们的外请编校吗？——方）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